党史专家金春明教授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著作

大量难得一见的真实历史记录发人深省

“四人帮”沉浮录

金春明 著



知道一点当代史

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一个民族要配得上它曾经历的苦难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

郭沫若
1976年10月21日

1976年10月上旬开始，关于“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流传，许多民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在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兴奋地议论着。10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广播了这一消息后，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庆祝，表达欣喜若狂的情绪；10月21日，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北京150多万军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让中国人饱受折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那么，被称为“白骨精”的江青、“狗头军师”的张春桥、“政治流氓”的王洪文和“文痞”的姚文元，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又是怎样结成“四人帮”为非作歹，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怎样被党中央一举粉碎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党史专家金春明教授在本书中披露和分析了有关的历史真相。



上架建议|畅销·历史


ISBN 978-7-5108-1992-6
9 787510 819926 >

定价：28.80元

党史专家金春明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四人帮”沉浮录

金春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人帮”沉浮录 / 金春明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08-1992-6

Ⅰ.①四… Ⅱ.①金… Ⅲ.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Ⅳ.①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540 号

“四人帮”沉浮录

作　　者　金春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4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992-6
定　　价　28.80 元

引　言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

沉寂多时的著名学者、诗人郭沫若，躺在医院病床上愤笔疾书的这一首《水调歌头》，在1976年金秋的神州大地上广为流传，充分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仇恨鄙视和他们被粉碎的欢畅心情。长安街上的红旗锣鼓、万人游行，千家万户高举酒杯的欢宴，以致鞭炮和酒类一时为之一空，显示了广大群众对又一群丑类倾巢覆灭的欢庆心声。这些是经历了那个大动乱年代的

人所终生难以忘记的。

最早提出“四人帮”这一名称的是毛泽东。他在1974年7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975年5月3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啊？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①] 不过，从毛泽东的批评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的“四人帮”只是搞少数人的小宗派的意思。同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其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需要先弄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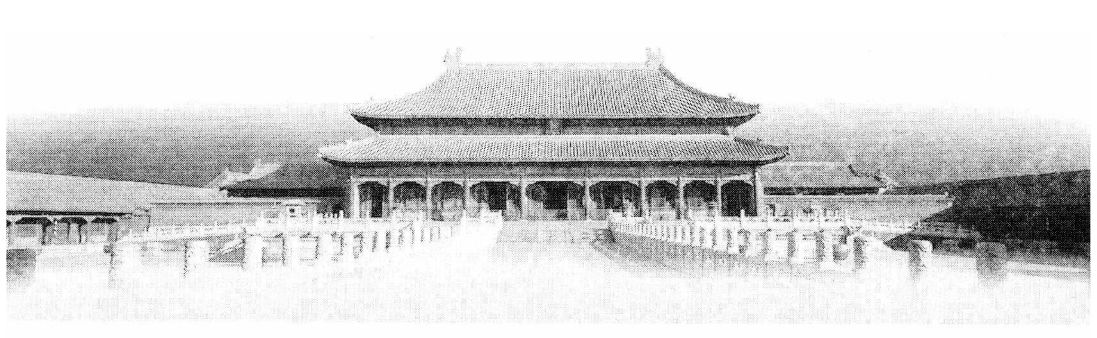
那么，被称为“白骨精”的江青、“狗头军师”的张春桥、“政治流氓”的王洪文和“文痞”的姚文元，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又是怎样结成“四人帮”为非作歹，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是怎样被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就是这本书要向读者们讲述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12页。

目 录

一　“四人帮”的底细

1. 江青：从旧上海影星到“文艺革命旗手”
2. 张春桥：靠一篇文章起家的“左派理论家”
3. 姚文元：看风转舵的文坛打手
4. 王洪文：不想吃技术饭的“造反英雄”





“四人帮”中年纪最轻而又提升最快的当属王洪文。短短数年的工夫，就从最基层单位的一名小干事，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曾一度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此，在刚打倒“四人帮”时的中央文件中，把四个人的顺序排列为王、张、江、姚。但这只是按职务高低的表面情况的一种排列，并不符合真实情况。所以不久之后就改变了排列次序，为江、张、姚、王。这就符合了这个反党阴谋集团内部的实际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这个集体依靠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崛起的最大特点。

为了便于说明后边的问题，让我们先对这四个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 江青：从旧上海影星到“文艺革命旗手”

江青于1914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其父李德文是颇有房产出租土地的地主，娶有一妻一妾。江青为妾所生，小时名进孩，7岁入女子学堂时，由老师取名李云鹤。1926年因父亲病故，由母亲带到天津市亲戚家居住，曾在英美烟草公司当过几个月的童工。

1929年夏，李云鹤在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参加几部话剧的演出，颇得好评。1931年5月，同她的“第一个求爱者”魏明伦结婚。但两个月后她就离开了魏明伦，而到青岛投奔原实验剧院的领导人、时任青岛大学副校长的赵太侔。

在青岛大学，她在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并到系里听课，半工半读。在赵太侔家里，她认识了赵夫人俞珊的弟弟，当时正在青岛大学读书的俞启威（黄敬），两人很快由相恋而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只做了两个月的党员，就由于俞启威的被捕而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在青岛难以立足，李云鹤又经俞珊的介绍而去上海。

1933年5月，李云鹤到上海大夏大学做旁听生，同时参加了话剧演出和一些进步学生运动。同年10月，参加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9月被捕入狱，12月，经左翼教联的营救获释出狱。

1935年春，李云鹤在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为蓝苹。半年后，她与捧她的影评人唐纳同居。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影艺界人士举行集体婚礼，一时颇为轰动。

在上海这几年的时间里，蓝苹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与女演员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二是与唐纳闹爱情



三十年代的江青（蓝苹）是一名话剧演员。身材细高，长相俊俏。



江青为《中华》杂志拍的封面。

纠纷，以致唐纳[1]两度自杀（均获救），成为报刊上抢手的桃色新闻。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爆发后，蓝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总括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几多曲折艰辛，也颇多沧桑，这里反映了她有追求革命进步的一面，但也突出地反映了她任性与浪漫，追求名利和享乐的消极一面。

1937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从此开始了她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毛泽东。

有的小册子说，江青认识毛泽东是由康生介绍。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江青到延安是1938年8月，当时康生尚在莫斯科。康生是1938年12月到延安。毛、江相识当在康生回延安之前。

江青于1938年11月同毛泽东结婚。在抗战八年中，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2]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年进北京，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从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

① 唐纳（马季良）（1914—1988），文化人。1948年从香港去美国，在中文报社工作。后去巴黎，经营中餐馆。因肺癌病逝。

② 杨银禄：《江青的感情世界（上）》，《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6期。

顺的中国第一夫人。

随着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不过一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她主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做些秘书工作。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①]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

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人员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

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①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页。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六十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并派张春桥给她当助手。江青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不无感激之情地说：“一九六一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①]，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②]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所谓“文艺革命”只不过是后来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而江青正是借毛泽东批文艺界的东风，举起“文艺革命”的大旗，戴着“文艺革命旗手”的灿烂光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从此之后，她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显赫，也发挥越来越大的破坏性作用。

---

① 所谓“有鬼无害论”是由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一戏中出现鬼魂的形象而引起争论中的一种意见。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发表了一篇文章，肯定了这个剧，题目叫《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戏文章称赞《李慧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批判文章，就是对此而发的。

②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页。

2．张春桥：靠一篇文章起家的“左派理论家”

这又是一位山东人。1917年张春桥生于巨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开益在北洋军阀时当过县邮政局局长，国民党时当过少校军医，日伪时期当过伪军的团军医主任。但是，张春桥一直谎报自己的家庭成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一直到1973年党的十大填《代表名册》时，还填家庭成分为自由职业者。

张春桥于1933年在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由校训育员、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组织的华蒂社。所谓“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在“华蒂”社的刊物上，张春桥曾发表过反动诗文。这个华蒂社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但说它是特务组织也过分，最多只不过是国民党特务复兴社的外围组织而已。

中学毕业后，张春桥到上海，先是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以后又从事过其他文化工作，还常写点小东西刊登于报纸杂志上。在上海的几年中，张春桥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大文豪鲁迅，而鲁迅则发表《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反击。从

此，“狄克”一名就成为张春桥的一块心病，讳莫如深。上海造反夺权之初，上海徐汇藏书楼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因为考证出“狄克=张春桥”而遭隔离审查，有的还被关押多年。

1938年，张春桥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奔赴延安，并于同年入党。此后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直做到《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的主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既没有什么突出的功绩，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劣绩。但有一件事对张春桥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这就是张春桥得到了柯庆施的赏识，当时柯庆施任石家庄市市长，就把张春桥调到市府当秘书长。

1949年建国后，张春桥到上海工作。1954年陈毅调中央当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调上海当一把手，张春桥从此步步升迁，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等职。实际上是柯庆施的大政治秘书。他结识了江青也是由于柯庆施的介绍。柯庆施于1965年4月病逝后，江青便成为张春桥的最大靠山。

使张春桥全国闻名的一件事，并不在于他的职务，而是他1958年写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众所周知，首先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争职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低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并肯定过去解放区的供给制，批评建国后实行的工资制，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张春桥，于是，张就赶快写出这篇文章，发表于《解放》半月刊1958年6期。张文先是引证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肯定红军实行供给制的一大段话，强调这是“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也是“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他批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认为，这些人要刺激的，“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争论。

此事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张春桥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毛泽东北戴河会议讲话观点的复述和阐发，因此，自然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和肯定。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转发了张春桥的文章，并发表由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编者按。按语说：

>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样，就使这篇文章非同一般了，不仅扩大了张春桥在全国的知名度，也成为张春桥以“无产阶级理论家”自诩的一个重要

资本。这篇善于辨别风向、投其所好的文章，就成为张春桥后来受到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关键一环。当然，把张春桥直接带入“文化大革命”领导核心地位的，还是他伙同江青、姚文元共同炮制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我们后边再谈。

3．姚文元：看风转舵的文坛打手

1931年姚文元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其父姚蓬子曾是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作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叛徒。解放后，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关于这件事，鲁迅曾写过一段很深刻的话："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所谓'文学家'，在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了，又立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姚文元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

姚文元于1948年在上海一个中学里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参加工作，一直在意识形态部门，如卢湾区团工委宣传部、区委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等。在这些部门中，他并非主要领导人，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业绩，但却颇有点小名气。这个名气概而言之就是，善于看风转舵、改变面孔和勇于讨伐文坛老将，无限上纲打棍子。下边就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反胡风[1]。姚文元因为父亲的关系，很小时就认识胡风。他曾公开赞扬胡风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以有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胡伯伯”而引为自豪。并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胡风的著作，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专著。可惜，专著还没有完稿，批判胡风的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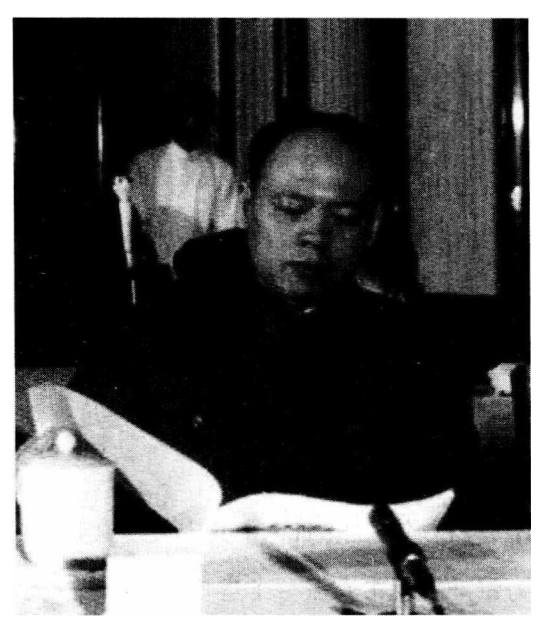
姚文元一方面为自己的辛苦劳作泡汤而沮丧，另一方面也为稿子尚未送出而庆幸，不然就泼水难收了。但他赞颂过胡风是大家知道的，于是想了一条妙计：反戈一击。在1955年初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上，24岁的姚文元作了调门高昂的批判发言，说“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如此等等。这种180度大转弯使了解他的人大吃一惊。

这里附带说一句，张春桥和姚文元虽然早就见过面，但张对姚比较冷淡。正是在这次批判大会上，使张春桥感到姚文元是一个可用的“左”字号打手，而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结合。也正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文艺月报》发表了姚文元这次大会批判发言的一部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随后，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多篇调门高昂的批判胡风的文章。1955年6月1日，经张春桥推荐，姚文元的一篇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的文章，又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

① “反胡风”是建国后发生的一件把文艺思想误作反革命的大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彻底平反。

报》上。

此前的六年里，姚文元发表过八篇作品，但都是“读者来信”之类的小“豆腐干”。与这几篇批判胡风的文章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这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是这位“文艺理论家”的发家之作。



凭借着那篇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青云直上。

再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的表现。在批判胡风大大出了一番风头之后，姚文元有一年多没有发表文章。据了解情况的人说，姚文元这不寻常的沉寂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他的爸爸姚蓬子由于同胡风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同潘汉年案有牵连，而被拘捕审查；二是姚文元本人也因此而受到组织的审查，要他交代与姚蓬子的关系，还有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三是与前两件事直接有关的是热恋的女友同他吹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小有名气的“棍子”再也提不起打人的那股劲。他只好请求张春桥的帮助，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新

筹办的刊物《萌芽》半月刊，当了一位诗歌编辑。

姚文元这个人是很会看风头的。1956年到1957年春的政治缓和，提倡“双百”方针，特别是整党初期的鸣放，也影响到姚文元。于是，他也鸣放起来，发表了一些面孔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论知音》、《放下架子》等，大喊“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而且公开赞扬了很快被打成“大右派”的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文章。按照当时的标准，姚文元的这些言论是足够划为一名右派分子了。这次又是张春桥救了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就在这之前两天，6月6日上午，张春桥打电话给姚文元，透露给他这一重要消息，而且告诉他要轰《文汇报》。姚文元十分紧张，立即发挥其政治投机的特殊灵感，连夜写成一篇《录以备忘》的千字文，以上海两家报纸《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对待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谈话的不同态度为例，批评了《文汇报》编排的政治倾向错误。《文汇报》迫于6月8日后的政治形势，在6月10日刊登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

可是，恐怕连姚文元本人也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毛泽东这个时期十分重视上海《文汇报》，是当时抓的右派舆论的典型。从该报上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颇为欣赏，而且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当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同时让《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汇报〉

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两文同时发表于《人民日报》6月14日第一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日的新闻节目中还作了摘要播发。

毛泽东的肯定、中央报刊的转载和中央电台的播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全国瞩目、非同小可的事情。柯庆施听过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马上下令召见姚文元，并当面夸奖他“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被提拔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时年26岁的姚文元顿时神气大涨，不可一世，大写批判右派的文章。从6月10日发表《录以备忘》开始到年底，在1957年下半年里，姚文元共发表大大小小的反右文章五十多篇，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坛打手，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①

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亲自出面为姚文元抹粉，称他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但棍子就是棍子，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打人的功能是没有区别的。

当然，直接使姚文元青云直上的是那篇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关于这篇著名的大批判文章我们在下边讲。不过，从上述反胡风和反右派的两段经历，我们就不难了解姚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被江青选中作为打开“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先锋官不是偶然的了。

① 反右派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场错误的、扩大化的、负面影响深广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作了重新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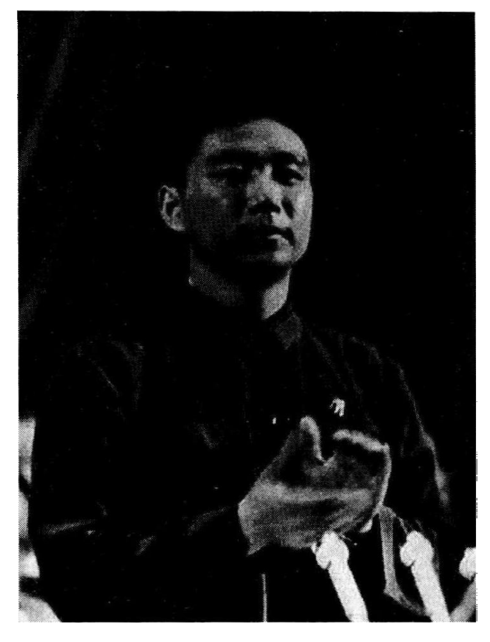
4. 王洪文：不想吃技术饭的“造反英雄”

王洪文于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农村。小时除上学外也帮家里干一些农活。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没有什么战功。1956年复员后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一个几万工人的大厂，先是当保全工，以后又当上保卫科的保卫干事。同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崔根娣结了婚，这样就落户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十年的经历几乎是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当工人时不好好学技术，公开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要“吃政治饭”。经济困难时期被下放到崇明岛种地，被大家评为：“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到保卫科工作后，经常偷拿厂里的东西，什么木料、花布、修房子的水泥等，以致“四清”时成为工厂里被清查的对象，当众出丑。从而也打破了他想当保卫科长的美梦。无怪乎他后来青云直上衣锦还乡时，得意洋洋地对小兄弟们说：“想当年如果提拔我当科长，我能造反吗？不造反，能够有今

天吗？”

这就是曾被吹捧为“种过地，打过仗，又是工人领袖”的王洪文的真实历史经历。王洪文的真正政治经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开始的。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全国也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有过王洪文这样一个人了。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年38岁。

上边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下边就要进入正题了，谈一谈他们是怎样勾结成帮、青云直上、骄横一时、祸国殃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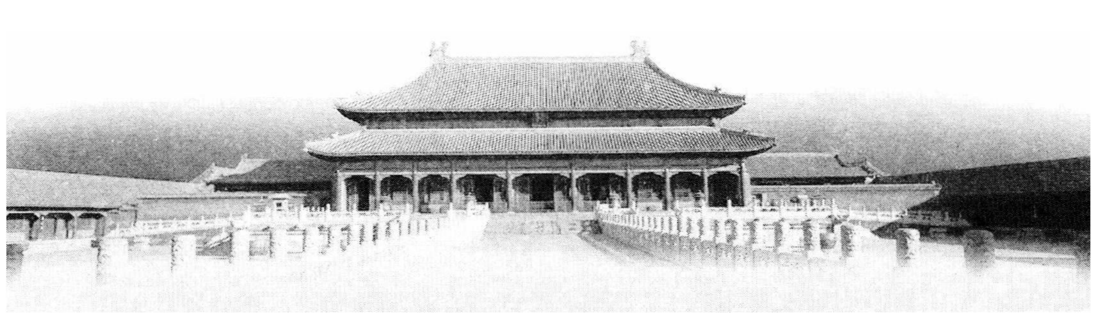
二　“小人物”蹿升政治核心的四大法宝

1. 江青以特殊身份捞取政治资本

2.《海瑞罢官》与姚文元升官

3. 请来了林彪这“尊神”

4. 从运动群众中获利





从上边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人情况的简要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从党内看，没有一个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没有一个是中央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最高的党内职务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处长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从级别上看，只有江、张二人够得上副部级（江青九级），而这种级别以上的干部全国有数万人之多。姚文元的善打棍子虽已小有名气，但只能在文艺理论界的有限范围内显显威风，够不着政治高层，人家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王洪文更是个基层单位最下边的小干部。总之，他们是些在中国政坛上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夜之间成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主要成员，成了令全国亿万人侧目而视的不可一世的发号施令者，成了显赫一时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中央首长”。而且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竟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而王洪文也成为中央委员。

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洪文成为修改党章报告的报告人，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控制了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大权，他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声势赫赫的“大人物”。

这样火箭式的快速飞升，实在令人视之目眩，有百思而不得其解之感。

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经过认真反复的研究和梳理，对他们这种火箭式飞升的原因，似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1. 江青以特殊身份捞取政治资本

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

在大家的眼里，她有一条“通天”的特别渠道，可以上达“天听”，又可以下传“圣旨”或“最高指示”，这就比正常渠道更灵通百倍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民主发挥较好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功能并不怎么显著。但是，当党内“左”倾错误日益发展，党内关系十分紧张，个人崇拜盛行，领袖出现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领导集体的状态时，特别是领袖的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作用就异乎寻常地急骤膨胀起来。十年内乱的经历，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的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①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十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四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




抗战初期的毛泽东和江青。



江青在延安时喜欢骑马。

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

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最厉害的王牌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自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①

毛泽东同江青虽然已经不能同住一室，也很少同桌共餐，但政治上毛对江仍是信任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但把江青作为依靠的重要助手，而且是委以重任和寄予厚望的。而江青则是倚仗毛主席的信任，做了许多坏事。下边的几件事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一件事，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据江青说，这个问题是她先向毛主席提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主席并不同意她的意见，说她把整个历史界都看成一片黑暗，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3页。

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①

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②

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

第二件事，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才能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

---

①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页。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7页。

什么像样的职务，不好出台亮相。

这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①]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向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于是，江青去找时任国防部长的元帅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他们与江青一起，也是5个人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共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1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

---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个领导文化领域里的整顿和斗争的机构。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任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还有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部队同志整理的座谈会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据说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很明显都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第三件事，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

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五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

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至于是否真正请示过，是否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份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太上皇。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转战陕北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还有一件更能表现毛泽东对江青信任的事，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运动，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重大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的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

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

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综上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四人帮”的最大政治资本，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条件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2.《海瑞罢官》与姚文元升官

“四人帮”中写大批判文章最多的是姚文元，是声名远扬的以笔杀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金棍子”。“四人帮”靠大批判打人起家，以他最为典型。前边在讲到姚文元其人时，我们已经就反胡风和反右派两场政治运动中他的表现作了概括。下边就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起了重要作用的四篇代表作，略作分析和评述。

《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第一篇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大批判代表作，使35岁的高中毕业生姚文元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理论家”。这篇文章曾获得很高的评价，并被写入林彪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自然，报告中没有写姚文元的名字，而是写“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

但一提到批判《海瑞罢官》这篇恶毒的文章，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姚文元，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这篇大批判文章有什么特点呢？概言之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混淆时间顺序，以便以“现实阶级斗争”找寻依据，无限上纲，硬给作者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姚文元的画龙点睛要害之笔在文章的结尾。他说：“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退田’、‘平冤狱’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结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对于姚文元的谬谈，已经有很多人作过详细的批判，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姚文元为了强加人罪，连起码的时间顺序的逻辑也不顾了。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从1959年秋酝酿起草，中间七易其稿，到1960年底才定稿。原名《海瑞》，后接受老友植物学者蔡希陶的意见，认为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他当江南巡抚时的一段，才改名为《海瑞罢官》。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姚文元也承认是发生在1961年之后，那么，以前写的剧本怎么能成为写成后才发生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呢？这真是荒唐的逻辑！

这篇文章由于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的导火线，它的影响所及远远不只是学术界。首先是株连古人海瑞及有关人等。由于“海瑞罢官”宣扬的是明代的清官海瑞，所以凡是与海瑞有关的一切都遭了殃。北京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由于主演《海瑞罢官》，而遭批判污辱饮恨而亡。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也由于主演《海瑞上疏》而犯了“反革命”大罪，受尽凌辱含冤死去。所有写过有关海瑞的文章、故事以至连环画一类作品的一干人等，无一幸免。甚至已经死去近四百年的海瑞本人葬于海南故乡琼山的坟墓，也遭到红卫兵的挖毁，暴尸白骨，破坏无遗。

其次是株连到所有表态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故意设下圈套，让《文汇报》开辟专栏，展开所谓学术争鸣；同时邀请在沪的著名专家学者座谈，“引蛇出洞”。结果又使一大批人上当。像上海著名历史教授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均遭批判，有的还被迫害致死。甚至连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信的一般读者，张春桥也一个都不放过。三千多封读者来信被逐一转到来信作者的所在单位，使这些人也都蒙受了各种灾难。

再次，扩大范围，无限株连。由于《海瑞罢官》是讲述历史上的清官因坚持正义而遭贬谪的故事，被诬指为替彭德怀翻案，于是由此而引申，凡是讲述中国历史上类似清官故事的文章著述，一律都与“为彭德怀翻案”联系起来，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牵入一场空前的大文字狱中。如《羊城晚报》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李世民与魏征》的文章也遭到批判，如此等等。可见，姚文元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危害是何等广泛而严重。

“金棍子”疯狂制造“三家村”冤案

第二篇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发表于1966年5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人民日报》和其他很多报刊都作了转载。这篇文章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是为了配合党中央正在召开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打倒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而作炮火攻击的。当然，也是同前两天，即5月8日发表于《解放军报》上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南北呼应，互相配合的。

由于这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半年前，全国已经是硝烟弥漫、乌云滚滚，所以姚文元也就脱去了第一篇文章中那种可怜的一点点学术伪装，赤膊上阵，不加任何掩饰地抡起棍子猛打。《评“三家村”》一文一开头就指名道姓，棍帽齐下：“《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

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就这样，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杂文，就变成了当时属于头等罪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弥天大罪。

文章的结尾发出了煽动性的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这里已经十分明白地暗示，批判“三家村”绝不只是要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而是要摧毁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这个“大黑店”。而且不止于此，文章还说：“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真是好大的口气，好大的气魄！姚棍子的口气和气焰的升级，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秉性问题。他只是一个政治晴雨表。这种升级正好是江青一伙在中国政坛上急骤上升、气焰嚣张的一种反映。

“三家村”冤案的直接后果是邓拓自杀，以死相抗。吴晗冤死狱中，他的夫人历史学家袁震被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也被捕惨死，一家四口只剩吴彰一个小男孩。廖沫沙在狱中受尽折磨，终于看到“四人帮”倒台，得以重见天日。至于全国因“三家村”而遭株连的各色人等，难以计数。

挖“黑线”，周扬等文艺界前辈被害

第三篇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转载于全国各大报。这篇文章以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和

文化部的负责人，所谓“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为靶子，直接目标是贯彻江青挖“文艺黑线”的方针，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也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和延安文艺的巨大成果。而在客观上更广泛的意义，则是配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发端的全国全面夺权，为造反派夺取党政财文大权制造理论依据。

正是为此，姚文元在一开头就把批判周扬的意义估计得十分重大。文章说：“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请看，这就绝不只是周扬个人的问题，也不限于“‘文艺’黑线问题”，而是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不只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而是要“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可见，姚文元的口气是非常之大，野心也是不小的。

那么，他如何评价周扬这位理论文艺界的前辈和权威呢？对于姚文元来说，这并不复杂，也不需要讲任何理由，直截了当地戴上“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就是了。反正当时的周扬已成为“阶下囚”，没有答辩权；别人谁又敢出来说话？即使有人敢说又有什么报刊敢发表呢？因此，姚文元说什么就是最高判决。

他说：“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

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断章取义、篡改历史的所谓分析批判。

如今的青年人不了解当年的“革命大批判”是什么货色，如果有兴趣的话，倒不妨读一下姚文元的这篇大作。那真可以称作是“现在和今后识别棍子加帽子的‘革命大批判’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姚文元是靠批《海瑞罢官》起家的，这里也没有忘记把周扬同演海瑞戏联系起来。他说：“1959年，他到处宣扬‘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就是周扬。”

事实真相是，1959年在上海会议上首先提出要学习和发扬“海瑞精神”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扬，吴晗正是听到胡乔木传达的毛泽东指示，才应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以至写剧本的。周扬自然也是自以为是在宣扬毛主席的指示，哪里会想到竟成为姚文元笔下的反党合唱总指挥呢？这段历史真相今日已广为人们所知了，这里也就不需要多说了，只是可以从文中看到姚文元的蛮不讲理和歪曲史实。

姚文元批周扬，并不是专打一个人，而是为了“挖黑线”，打击文艺界的一大片。对这点文章中并不隐讳。文章说：“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

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个黑线之内的人物。”这被点名的12个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不熟悉，但他们可都是活跃于30至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的名人。例如：

胡风（1902—1985），前边已经说过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他长期以来都是周扬的对立面，这里把他列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大概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吧！

冯雪峰（1903—1976），30年代初在上海曾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曾任上海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冤案得到昭雪。

丁玲（1904—1986），是20年代就在中国文坛上显露头角的著名女作家。1952年她创作的以描述土地改革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建国后她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1955年被定为反党集团分子而遭到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得平反。

田汉（1898—1968），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30年代初他曾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抗日时期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

主编《抗战戏剧》、《戏剧春秋》等刊物。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四条汉子”的成员，被迫害致死。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阳翰笙（1902—1993），著名的剧作家。大革命时曾任北伐军第六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他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抗战时期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上海戏曲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等。建国后他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党组书记等职，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1979年后得到彻底平反。

邵荃麟（1906—1971），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工作。1934年他任上海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传部长，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出狱后，在桂林从事文化界抗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赴香港，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书记。建国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是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

上边已经写了六个人，其他六个人，艾青是著名诗人，秦兆阳是著名作家，林默涵是文艺批评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齐燕铭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是著名剧作家、中国电影界的

祖师爷，陈荒煤是文化部的电影局长。总之，这12个人都是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情况也各不相同。可是，姚文元却一棍子把他们统统打入一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他们都悲惨地倒在了姚文元的大棍之下。而且他们每个人倒下之后，都要株连到一大批人。这大概就是“革命大批判”的无比威力吧！

万字长文攻击陶铸

第四篇是《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于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陶铸是什么人呢？为何姚文元要大动肝火写出万字长文拼命攻击呢？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陶铸。

陶铸（1908—1969），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市委书记等职。

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他先后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建国后长期在华南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陶铸被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被称为“第四号人物”。陶铸可以说是革命资历很长，既有战功又有政绩的大人物了。可是，因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而遭到阴谋陷害。仅当四个月的常委，就被批斗关押，折磨致死。

像这样政务繁忙的高级领导人，大多数是不喜欢写文章的。可是，陶铸与众不同，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出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两书出版后反映颇好。笔者当年读过这两本书，感到颇受教益，是两本好书。可是，到姚文元的笔下却被歪曲诬蔑而面目全非了。不过，当姚文元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陶铸已经是毫无申辩权力的阶下囚，只能听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进行“大批判”的呢？我们只举几个例子：

陶铸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这有什么错呢？革命导师不是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用一切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吗？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指：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说，搞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0页。

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没有讲"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讲"依靠突出政治"，"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姚棍子这么蛮不讲理的胡批乱扯之后，陶铸认为社会主义要用一切办法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正确主张，就变成了"反动透顶的'机会主义'理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第一个例子。

陶铸鼓励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学习文化，消灭文盲，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不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成名成家，就是歧视工农兵。他说："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真是无理搅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逻辑。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难道工人、农民、战士就不应当学习科学文化，使自己成为本行业、本部门的专家吗？难道他们就应当永远处于缺少科学文化的愚昧闭塞的社会"最底层"吗？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使

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这一差别的消灭，只有通过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不是靠把社会中的高文化层次降下来的办法才能逐步实现的。姚文元摆出一副站在工农兵立场反对成名成家的极左面孔，恰恰暴露了正是他自己背叛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正确的是陶铸，而不是姚文元。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陶铸认为："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曾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的现象给予尖锐的批评。他说："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可是，姚棍子却偏偏要从鸡蛋里挑骨头，向众所公认的真理挑战。

他是怎样歪批的呢？他说："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就是这么一种打着"阶级分析"旗号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的古怪不通的逻辑，今天看来只会引人发笑。不过也可以算作是“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经典之作。

今天如果哪一位想要了解一些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大批判”，读一下姚文元的这几篇文章就可以知其真面目了。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不堪入目的低水平的东西，竟然被作为理论权威，判别是非的尺度，成为使无数人遭难的依据。

3. 请来了林彪这“尊神”

“四人帮”虽然有特殊身份作为政治资本，又有“大批判”的笔杆子可以打人，但到底是资历太浅，在党内的地位太低，社会知名度不高，而且在学术界名声不太好，势单力孤。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必须请他人帮助，借他人的势力以自重。

被江青选中的借用力量就是林彪。这点江青也是自认不讳的。她在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当众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就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①

这段话的立论和结论都是不对的，被她攻的不是资产阶级代

①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

表人物，也没有“吓得屁滚尿流”，“尊神”也不是整个人民解放军，而是林彪集团。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她确实是处心积虑地请“尊神”来帮自己，为自己壮声势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涵远不只是江青要借林彪之力，宣扬自己的“文艺黑线论”，而是用以为其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突破口。它还是江青与林彪两个阴谋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反党联盟的一个标志。从此，两个反党集团勾结起来，互相策应配合，共同作乱了。有何为证呢？他们之间在当时的互往信件和谈话，就是最好的证明，请看：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



1966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与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内交谈。

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态度十分恭谨。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像这样重要的信息，当然是林彪非常想知道的，也是只有江青才能给予他的。

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

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林彪作了这样一番肯定之后，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会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

如果说两个集团的勾结和互壮声势通过这种正规文件的形式，比较隐蔽，文字也比较讲究的话，那么在另外一种场合，比如群众大会讲话的场合，就相当公开而露骨了。作者手头正好有一份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通过讲话中的互喊口号，这种关系就看得清楚多了。下边略举数例：

> 当林彪说道，虽然批判了"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决不等于说二月逆流这批人可以翻天"时，江青马上大呼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跟着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接着姚文元又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

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林彪讲到所谓“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时，他的老婆叶群马上带头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

当林彪讲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时候，叶群马上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的迫害！”江青也马上喊口号作为回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林彪的大干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马上代主回报，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很会看时机的姚文元也随即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吴法宪又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回报以：“向同志们致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真是一个难得的互相声援致意的热烈场面。仅从这样的场面也许会得出两个集团是真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结论。但是，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认知，那就是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了。其实，两个集团之间，既有互相勾结、支持，狼狈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一面。就总体而言，在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两个集团是以勾结为主，以共同作乱，

打倒所谓“走资派”为共同目标；而九大以后，则逐步转为以争夺为主，矛盾日益尖锐。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准备在下边结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再作叙述。

4. 从运动群众中获利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

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

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1.8）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

武汉"七二〇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纲"、"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个人的小

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

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工，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这正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天下大乱”的必然后果。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由张春桥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

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

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造反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

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1]等等。

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最终，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

---

① 《乱世狂女》，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83-284页。

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提出坚决罢上海市委书记[1]、市长曹荻秋的官，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施展十八般本领，大大折腾了一番，造了声势，为张春桥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贡献了犬马之劳。

上边讲到王洪文，他就是借群众组织头头的身份而迅速飞升的。他先是在本厂——国棉十七厂给党委贴大字报，但因本人名声不佳又缺人望拉不起队伍来，就转而到社会上活动。1966年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三十多人，在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中共党员（参加那次会的只有两个党员，当时党员带头造反的还不多），又会讲普通话，所以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9日的工总司成立大会。接着又带领工人抢火车北上，要"赴京请愿"。被阻安亭后又卧轨阻断铁路交通，成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领头人。后来又同奉派解决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结识，这样就成了著名的"造反司令"。

他由于张春桥等人的推荐，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在那个人崇拜极端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印象如何，对一个人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的好印象，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谈话中

① 中共省市书记的称谓，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称为书记、副书记。1956年党的八大后、中央设书记处，有总书记和书记（若干人）。省市级亦设书记处，称第一书记和书记（若干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恢复书记处，省市级不设书记处，又称书记、副书记。当时是设书记处的，故陈丕显称第一书记，而曹荻秋、杨西光等皆称书记。

就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说："我是历来觉得上海比北京强的，因为上海它有120万产业工人掌握局势。"

在谈到参加全会人员的编组和各组召集人时，第一次参加中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而且本身又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洪文，被指定为第三组召集人之一。这时，毛泽东特别介绍说："王洪文是上海的工人同志。"周恩来补充说："'工总司'代表，也是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

在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后征求上海同志有什么意见时，王洪文回答："坚决拥护这次全会制定的决议。"这时，毛泽东说："唉，你站起来给人家看看，人家都不认识你呀。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只有三十几呀？（王回答：34岁）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嘛，主要成员之一。他就是这个所谓一月革命之前呀，前年11月搞了个安亭事件。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有这么年轻的同志参加，也是好事呀，可惜太少。"

看来，毛泽东是把王洪文看作上海120万工人的代表而寄予厚望的。当然，也是考虑到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而期望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有更多的年轻人涌现。这个主观愿望不能说没有合理的因素，可惜的是选人不当，选了个王洪文。这其中大概也有受江青、张春桥等人蒙蔽的因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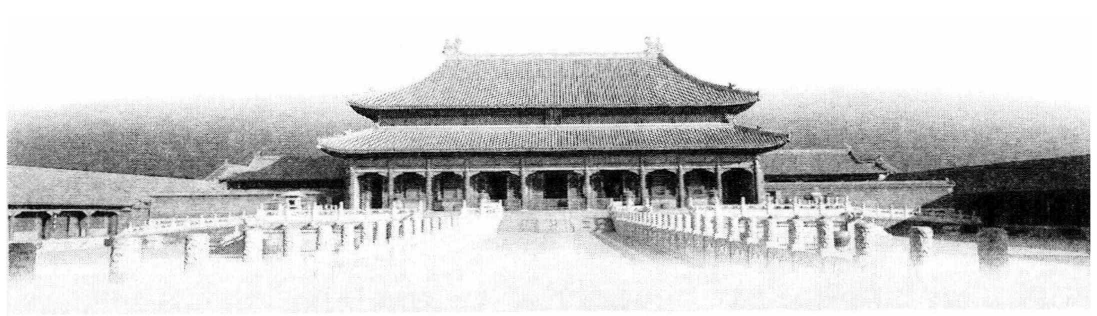
"四人帮"利用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名义来达到自己阴谋目

的的事例甚多，我们下边讲到他们的各种罪恶活动时还会不断地谈到，这里就先讲这几个事例。

总之可见，“四人帮”的迅速飞升可以说靠的是四大法宝，即：以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为重要政治资本；打着“革命大批判”的名义用笔杆子为武器打人起家；借助林彪集团的势力以壮声势；煽动和利用群众运动、群众组织以达到小集体的阴谋目的。这四个特点中，只有同林彪集团的勾结持续了五年，随林彪的折戟沉沙而告终，其他三项：特殊身份、笔杆子杀人和运动群众三个特点是贯彻在这个反党集团十年活动的始终的。

三　制造“天下大乱”的能手

1. 炮制“黑线专政论”掌控舆论
2. 操纵群众组织，酝酿大阴谋
3. 炮制大冤案，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
4. 编造“四大罪状”，打倒总书记邓小平
5. “四号人物”陶铸被迫害凄凉离世
6. 总理周恩来被罩“叛徒”阴影
7. 抢先“告御状”，打倒大批将帅
8. 夺权大上海，作为篡党基地
9. 蓄意鼓吹派性，策划武斗升级
10. 江青为掩丑史，指挥神秘抄家





提起“四人帮”干的坏事，凡是经历过那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年代的人，常常会引用一句古代成语“罄竹难书”。中国古代没有发明造纸术以前，是把文字写在竹板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砍光了山上的竹子也写不完他们的坏事和罪恶。何况这一本小册子，更难以把“四人帮”的丑恶罪行说得全面不漏，只好用中国传统的办法，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列为十大罪状（即十恶不赦），以昭告于天下。

1. 炮制“黑线专政论”，掌控舆论

所谓“黑线专政论”，出处是前边已经谈到由江青主持毛泽东批准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那段著名的话：“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段话，它从内容上说非常恶毒，非常厉害；而从政治上说，又是非常阴险的一招。

首先，《纪要》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补充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是毛泽东，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只是这一革命以“文化界”为突破口，最先从“文化界”开刀，这是毛泽东毫不隐讳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文艺界不满意，这也不是秘密。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两个批示，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而，要改组文化部，在文艺界搞整风。但他还承认，“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各种文学艺术协会中，“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还没有一笔抹黑，全盘否定。可是，到江青的这个《纪要》里就大大升级了。

第一，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样，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对立面推到了敌对阶级的地位上，成了胆敢与无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领导权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变成了专政对象。

第二，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战线的成绩一笔抹杀，作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样全盘否定的总估计。既然整个文化界的状况这样恶劣和黑暗，那么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的大风暴，也就理所当然的了。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毛泽东文艺批示的补充和延伸。

应该说，从基本估计和基本思路看，江青的《纪要》同毛泽东的批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纪要》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据说，毛泽东前后修改过三遍。第一遍改20处，第二遍改19处，第三遍改5处。又亲自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我又改了两处，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同志。”文件的标题中“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而在中共中央转发这份《纪要》的同时，转发了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信中，林彪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说的“极大的现实意义”，恐怕就集中体现在它为“文化大革命”补充了现实和理论的依据吧。

其次，《纪要》为江青出台充当协助毛泽东指挥“文化大革命”的助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增添了理论色彩和重要依据。前边已经说过，江青出场有两个重要法宝：一是有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尚方宝剑；二是有林彪的支持作为保护的“尊神”，而江青本人的资本却不多。当时只搞了两个样板戏，虽然打起了“文艺革命”的旗子，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江青是比较浅薄的。而这时则不同了，《纪要》提出了一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路线”的新理论，当然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但同时也为江青自己增添了理论资本。

这样，江青就一手捧着尚方宝剑，一手拿着“无产阶级文化路线”的令牌，两旁有“尊神”保驾，摆出一副正气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式，威风凛凛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了。

再次，《纪要》大大扩展了“文化革命”的内容和对象。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时间上限于建国以后，范围上只指新中国的文艺界。而《纪要》则把时间和范围都大大扩展了。时间扩展到所谓“三十年代文艺”。

三十年代前期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激烈的时期。在大江南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同蒋介石领导的白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激战，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动文化统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毛泽东曾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可是，江青的《纪要》虽然不敢公开否定鲁迅，却把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一笔否定了。《纪要》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如何评价这些世界知名的俄国资产阶级文艺家的思想和理论，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担的任务。但是，从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是利用这种方法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一笔否定的。而否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对于当年在左翼文艺中作了贡献的，而六十年代还在担任新中国文化战线领导工作的一大批人，包括周扬、夏衍、田汉等等，给予批判以至打倒，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范围则不限于中国，扩展到了国外。《纪要》中明确提出要点名批判的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纪要》说：

>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伊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江青当时把这项批判任务交给解放军，让军队组织一些人“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江青的胃口很大，她不仅要批判当时苏联的著名文艺作品，而且提出：“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大家知道，斯大林晚年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包括文艺方面也是“左”得很厉害的。可是，江青却认为斯大林“左”得还不够。她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江青同斯大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类人，但是她的这一番话却明确无误地表明，她要比斯大林更“左”。

最后，《纪要》的影响绝不仅是限于文艺界或文化界。既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文艺界，可以是被“一条黑线专了政”的，那么别的领域也就可以依此类推，扩大到各行各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黑线专政论”就急骤膨胀。

教育战线毛主席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是“黑线专政”；卫生战线，

毛主席已批评其领导机构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当然也是“黑线专政”；体育战线主管的副总理贺龙元帅都被批判打倒了，当然也是“黑线专政”，如此等等。开始还主要是意识形态部门，以后又扩展到外交部门、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农业部门了。

“黑线专政论”成了当时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重型炮弹。虽然周总理一再出面解释，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毛主席红线的光辉照耀到各行各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阻止“黑线专政论”的急剧膨胀和扩展。这种谬论的恶果是十分巨大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十分严重的。

2. 操纵群众组织，酝酿大阴谋

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但是，怎么样使天下大乱，又怎么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信中都没有说。不过，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对毛的意图是比别人有更多了解的。她知道毛泽东一生特别钟爱群众运动，于是就下大力气操纵和控制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制造天下大乱而实现他们的阴谋目的。

这样的事例很多，下边我们只举几件典型的，影响比较大的。

先说一个利用群众的名义投领袖所好的例子。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时曾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在中央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聂元梓等人自发地主动地写出来的吗？不是。它是受人指使授意而写出来的。这个指使授意人，就是林彪、“四人帮”的高参、“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

康生善解上意，是极少数比较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中央领导干部之一。于是，他就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带几个人到北京大学去了解情况，物色造反的带头人。北京大学地处首都，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是“五四”运动的带头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是被称为“庙小神灵大”的地方，在国内外都有较高声望。在这里找一个适当的人选，登高一呼，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不过，康生、曹轶欧开始要找的人并不是聂元梓，而是一位当时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聂高的人，这个人叫陈守一，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北大党委的常委。陈教授发表一篇回忆文章《历史是公正的》，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情节，现摘录如下：

> 1966年的5月上旬，我在家里，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她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曹轶欧……很快，这位曹轶欧便带着另一位姓

张的同志，出现在我的客厅里。……曹轶欧坐定之后，先问了问北大学术批判的进展情况，然后话锋一转，提出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应该给予揭发。我当时一怔，感到有些突然。我问道："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她挥挥手："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我莫名其妙了："北大的学术批判是我具体负责组织的。但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请你提出来，以便于我改正。"她笑了笑，慢慢说："你不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

第一次没有谈拢。

大约三四天后，也就是5月15日左右，曹轶欧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约我到友谊宾馆面谈。我去了，她和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接待了我。她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请她先把问题指出来。她犹疑了一下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然后，她还进一步暗示："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的。"

这次又没有谈拢。一直到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才终于明白曹轶欧约我两次谈话的意义何在了"。[1] 根

---

① 陈守一：《历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忆文革》。《中国研究》1995年秋季号，第161－163页。

据已经了解的大量材料证明，就是在曹铁欧找陈守一的第一次谈话之后，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主动找到曹铁欧，并在曹的授意和指使下写出那份大字报的。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墙上贴出后，当天就遭到很多大字报的批驳。据说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还派国务院外办的张彦到北大，重申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内外有别的规定。当时，聂元梓等人也很紧张。可是，康生自有办法。他派人到北大拿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通过简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给了这份大字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批示说："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很有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①

6月1日晚，中央电台播发这篇大字报后，次日，又发表于《人民日报》上。还配发了由曹铁欧、王力等人合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篇大字报的广播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在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功"不可没。毛泽东在后来讲到这件事时说："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

① 转引自《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① 可是，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是支持了群众自发造反的革命大字报，是支持了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实际上竟是出自阴谋家康生一手策划导演的产物，这大概也是历史的一种讽刺吧！

操纵群众组织，还能成为对付领袖指示的一个有效手段。1967年初，江青、陈伯达策划批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的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几乎都到会了。于是，江青、陈伯达就策划利用这个时机批斗萧华，并事先取得了林彪的同意。1月19日下午，江青、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批人来到京西宾馆。他们当面指责萧华“玩阴谋，耍花样”，“公开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给群众泼冷水”，是个“资产阶级政客”。② 责令萧华到当天晚上由他们指使的一派群众组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检讨。

所谓“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给群众泼冷水”，主要是指1966年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上，陈毅、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等老帅，针对部分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院，殴打警卫战士的错误，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批评和苦口婆心的劝说。这就引起江青、陈

---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② 纪希晨：《走向死刑的女皇》，《党员特刊》，1992年6期。

伯达等人的极端不满和严厉指责。在召开这次大会之前，萧华曾打电话请示过林彪，得到了他的批准。但得知“中央文革”批评这次大会后，林彪却否认事实，声言这次会议没有经过他的批准。于是，这一切就成了萧华的罪行。

萧华刚开完军委扩大会回到家里，奉命前来抄家抓人的北京军区体工队、文工团的造反派已经赶到，并翻墙进宅。萧华从后门逃出，几经周折跑到叶剑英元帅家。叶帅感到打倒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一件大事，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不能不报告，便打电话向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毛泽东指示要保萧华，让萧华不要到万人大会上接受批斗。这样才使萧华免受了一场灾难。被抄走的文件和物品也都追了回来。

毛泽东的指示，江青自然很快就知道了。萧华没有揪到，而且奉“最高指示”不准批斗，可是上万的群众已经召集，如何收场呢？江青等人自有办法。他们立即指使另一派群众组织去冲击批斗大会的会场，把大会搅散了。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灾难是躲过了，但江青等要打倒萧华的狠心并没有改变。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制造了所谓“五一三事件”，于是萧华便以“黑后台”的罪行被揪出批斗了。此后，陆、海、空三军和军队在京各大单位对萧华进行轮流批斗，总计大小批斗会达120多次，后来又把萧华关进监狱多年，受尽折磨。这些都是后话。这是第二个例子。

再说一个例子，就是利用群众组织去冲击打倒他们所要打

倒的人。这方面的事例很多，1967年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等一大批人，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对陈再道是不满意、不放心的。早在1967年初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是林彪所说的‘不好的人’呢？吴法宪等人作为林彪的亲信，当然一听便心领神会了。我（陈再道），就是林彪要‘揪出来烧掉’的人的其中之一”。[1] 到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林彪就讲得明明白白了。他说：全国各大军区中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2] 这就充分说明，林彪要整陈再道等人是由来已久，处心积虑的。

江青对陈再道也是不满意的。1967年4月16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中，就点名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3] 当时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都在北京，得知这一讲话后，就决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请求中央听取他们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

4月19日在周恩来主持下，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国宾馆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当时，江青曾“以略带歉意的口

---

①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② 林彪在1967年8月9日的讲话。

③ 转引自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得不对了’。”[①] “当时，我们看江青考虑那么周到慎重，说得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当然非常高兴。觉得上面这样处理问题，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江青这人会当面是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搞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②]

很快，在江青等人的唆使下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到了武汉。他们找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开会，散布“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并喊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使武汉局势日益恶化，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升级。7月14日，王力和谢富治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四个造反派从重庆赶到武汉后，更不断地火上浇油。

本来，毛主席和周恩来7月中旬到武汉是要“保”陈再道的。当然前提是要武汉军区承认在“支左”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造反派“工人总部平反”，释放这个组织的头头朱红霞，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经过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的会议，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领导干部的认识逐渐统一，陈再道也表示了愿意作检讨，问题已经朝着解决的方向前进。可是，19日刚刚送周恩来乘机返京，王力和谢富治马上到造反派的据点——武汉水利电

①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②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力学院，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力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①

于是，造反派以无数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在全市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同时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工总"等是革命派，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结果是极大地激怒了武汉市的百万军民，直接促成了"七二〇事件"的爆发。关于"七二〇事件"的经过，已有不少著作和文章，特别是陈再道将军写了《亲历记》，这里就无需多说了。

武汉百万军民揪斗王力这件事，就其本身来说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但群众的行动并非事先策划的，带有一定自发性，而林彪、江青的行动，则是有预谋的。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看，难免有一种受人激怒而上当、为他人制造了口实的感觉。陈再道将军在自己的《亲历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看来，这正是王力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也正是他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目的所在。要不，他以后怎么能成为反军乱军的'英雄'呢？"②他又说：武汉百万军民，"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然而，当时谁也

① 转引自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73-74页。

②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没有想到，这正是林彪、江青等人求之不得的”。[1]

果然，林彪、江青一伙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不仅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百万雄师”打成反动组织，乘机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职务，彻底改组了武汉军区。而且大造声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大会，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放。“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造反派纷纷出动，冲击各地军事机关，叫嚣要揪本地区的“陈再道”，为林彪、江青一伙酝酿已久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大阴谋，大造舆论，拉开了序幕。

不过，由于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对陈再道也予以保护，使林彪、江青掀起的这场大狂风没能刮多久，就不得不偃旗息鼓了。但是，挑动群众，制造事端，用以打倒自己不喜欢的人，实现自己的阴谋目的，这一套卑劣手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是表演得很充分的。

---

①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87-88页。

3. 炮制大冤案，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号大冤案，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司令部的代表，牵涉和株连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在“文革”十年中，仅因受刘少奇案株连而被判刑的人，全国多达28000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难以计算。无论从地位之高，牵涉面之广，株连人数之多等哪个方面看，这个大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造成这场大冤案的责任，当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他负有难辞其咎的领导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责任，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林彪与江青一伙是共谋犯，罪责难逃。但对造成冤案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江青、康生和谢富治。他们利

用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利用掌握的专案组的权力，大搞阴谋诡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制造伪证、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欺上瞒下、刑讯逼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见的。下边就举几个事例简略地揭露他们制造冤案的罪行。

“打倒刘少奇”的帷幕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揭开的。而其标志则是毛泽东亲自写下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而且还要“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用词很尖刻，上纲也很高，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的人是刘少奇，这点每个到会的人都是明白的。

中央全会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发了会议简报。不过当时很多人都在犹疑，有的人自己也正在遭到冲击，因此，批刘调子高昂的人不多。初次列席参加中央全会的姚文元，写了一张《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强调“炮打司令部”，“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这次中央全会虽然公开批判了刘少奇，撤换了他接班人的身份，把他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担任党的副主席，而且实际上处于停职检查的地位，但从总体看，这个打倒仍是有限的。按照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1995年写

的一篇回忆文章的说法："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打倒刘的意思，原来只是换换位置。"①后来，据说毛泽东还讲过，将来开九大的时候，刘少奇还要当中央委员，就是还要像王明那样。

综上可见，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的"打倒"和后来作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打倒，是大不相同的。在这点上也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是不完全一样的，他们是要把刘少奇不仅撤下领导岗位，而且要彻底打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过林彪、江青等人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党内批判，仅仅戴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是不够的，是不能获得毛泽东赞成的。因此，他们就大搞阴谋诡计，施展各种卑劣手段，要给刘少奇戴上"叛徒"、"特务"一类阶级敌人的帽子，为此而费尽心机。关于这一冤案的详情，曾参加两案审判的前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曾写了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最大冤案》，近25万字，翔实可靠。我这里只能从"四人帮"炮制冤案的角度，简单说几件事：

（1）设立专案组作为炮制冤案的工具。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不能管任何工作，只能接受批判检查。但江青等人并不满意。而要进一步整倒刘少奇，就需要进行专案审查。所以，经过一番密谋之后，由康生出面向毛泽东要求设立刘少奇的专案组。据说，毛泽东没有同意。毛说：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

① 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5期。

可是江青说：不能立，也要立。于是，不能设立刘少奇的专案组，就设立刘夫人王光美的专案组。

1966年12月18日，秘密成立了一个王光美专案组。实际上主要矛头是针对刘少奇的。但这样做总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后来，康生利用北航红旗等6个群众组织搞的联合调查团从湖南等地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了确凿的材料证明刘少奇历史上有问题，建议进行专案审查。

1967年3月21日，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同意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于是，刘少奇专案组就正式成立了。有了专案组就为炮制大冤案提供了合法的工具。从根本上说，专案组这种机构是不合法制的，等于在公安、检察、法院等执法机构之外，另立专政机构。但在党内又是有传统可依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砸烂的情况下，专案组具有了更大的威力。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指挥下做了大量坏事。

（2）突破党内批判的规定，把刘少奇问题捅向社会，为打倒刘少奇大造舆论。

8月份对刘少奇的批判，限制在参加党中央全会的小范围内，《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当时也没有在社会上公开（第一次公开发表是1967年8月5日，即写出的一周年）。10月份，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检讨，批判范围有所扩大，但仍限于党内的一定范围。虽然已经有人听到风声，在公开场合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或批判大字报，但影响面却不大。因此，江青一伙积极策划，突破批判范围，在社会上掀起更大的批判刘少奇

的浪潮。这个图谋通过他们操纵的学生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实现了。

1966年12月18日，也就是在王光美专案组成立的当天，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张春桥此人老奸巨猾，故意不说出刘少奇的名字，但蒯大富已经心领神会，连忙表态：“我们井冈山兵团刚成立，正想打一场大仗！”蒯大富回清华后立即进行了积极活动。

12月25日，五千多名清华教职工，带着大旗、横幅、大标语和大量大字报、传单，在广播车的导引下浩浩荡荡杀进北京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大罪状》。然后分兵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门广场，其他四路杀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于是，“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巨幅标语和各种批判大字报，出现在天安门城墙和繁华大街闹市上，在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震荡。

虽然这次所谓“12·25大行动”，报刊、电台都没有发消息，但却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这是第一次把“打倒刘

少奇”推到社会的公开有影响的大行动。然后，又通过文革《快报》作为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报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此后，对刘少奇的批判就逐步扩大范围，逐步公开化，逐步升级。其中，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结尾提出的八个问题，等于是向全党和全国公开宣布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

接着，5月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又联合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批判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指示。这时虽然尚没有公开点名，但批判的是谁已尽人皆知。这样就为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了舆论准备和群众心理准备。这一切，都是“四人帮”打倒刘少奇的预谋和举措。

（3）刑讯逼供、制造伪证，为莫须有的罪名找寻依据。

本来正常的专案审查首先要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核清事实的真假，然后才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得出科学的公正的结论。而江青、康生一伙搞专案却不是这样。他们是从主观需要出发，先给审查对象定好罪名，然后再按已定罪名的需要千方百计寻找所谓证据。找不到就使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刑讯逼供，制造伪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打人有理，棍棒底下出材料”；“没有材料，从被审人嘴里掏”等等。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冤案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少奇冤案炮制过程中，这方面的事实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看看“叛徒”的伪证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1929年在中央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临危受命，不惧艰险，于7月14日到达奉天（即今之沈阳）。8月22日，在一次准备亲自指导奉天纱厂工人罢工的斗争中，不幸与同去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孟坚（后改名为孟用潜）一起在工厂门口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工厂警卫班、商埠地警察三分局和高等检察处拘留所，但因无证据，本人又坚不吐实，无法定案。9月中旬，刘少奇被保释出狱。这件事的经过是清楚的，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给党中央有报告，党组织也是清楚的。现在，“四人帮”要把事实颠倒过去，要制造伪证，只能从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身上下功夫。

请看下列记载：

“孟用潜[①]在五月份被关押审查后，专案人员采取车轮战术，昼夜突击审讯35次，没有进展。”专案组1967年6月22日给康生的报告说他“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性问题，态度极不老实……他一件也不讲，死抱住不放”。在康生批示“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后，“从7月5日到13日，又夜以继日地连续审讯13次。每一次批斗会都是专案人员围成一圈，叫孟用潜站在中间，十几条嗓子轮

① 孟用潜（1905-1985），河北人，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27年入党。建国后，历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外交部党委人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

番吼叫，拍桌子，念语录，恐吓谩骂，威逼利诱”。“在7月上旬的一天，这个60多岁的老人，经受不住专案组的痛苦折磨，终于松了口，初步编造了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后‘叛变自首、出卖组织’的伪证”。

可是，8月19日孟用潜又推翻了原先的供词。他在给专案组的信中说：“最近一个星期，我的思想波动很大。关于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的交代，我必须承认是编造的，是欺骗了党。”此后，孟用潜又多次翻供，仅他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申诉材料就多达20份，但全部被扣押或毁掉。而且被警告，再翻案“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①

就这样，专案组利用各种伪证炮制了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开始看这份报告时并不十分相信，曾批示调阅所有的材料，但专案组按江青等人的指示，只报送了他们逼取的伪证。而有些很重要的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被逼供人翻案的材料，则一件也没有送给毛泽东。就这样骗取了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这批人确实很坏，是一批骗子、恶棍、阴谋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党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搞阴谋诡计，手段倒是高明的，别的本事却没有。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用最

① 以上材料均引自《共和国最大冤案》。

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锁起来，欺骗毛主席。比如说，好多人写材料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他们却有办法使毛主席看不到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还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帮”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只提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把刘看作是叛徒。把刘少奇看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当然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要负责任。但把刘少奇看作是叛徒，则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假材料骗了毛主席。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①

应该说，这个谈话是客观的准确的。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

---

① 《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4. 编造“四大罪状”，打倒总书记邓小平

江青一伙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自己要篡党夺权，因此，他们要打倒的绝不止是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中央第一线的全部领导人。只有打倒了别人，他们才能上台。那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自然是他们心目中必须打倒的人物。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对邓小平的第一次攻击是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利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的矛头明显地指向党的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和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也确实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犯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错误”。

江青等在会议期间曾策动一些人揭发批判邓小平，但响应者寥寥。作了揭发批判邓小平发言的只有一位邓小平的老部下，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但他的揭发很一般，没有什么有分量的材料。不过这个发言却是一种政治表态，从此，江青等把谢富治

引为知己，使谢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飞黄腾达。此后，谢富治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干了很多坏事。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因为他已于1972年病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他们对邓小平的第二次攻击是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虽受到一些批评和指责，但在最后改选中仍当选为中央常委，而且排名由第7位，升至第6位。虽然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不能领导工作了，但地位犹存。林彪、江青一伙对此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利用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攻击。

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的会议主题报告中，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等等。说他们两个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要负主要责任”。林彪在10月25日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是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林彪说：“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而且认定：“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这样一下子就把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打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范围之内。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被迫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很想用这种办法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彻底打倒。但毛泽东的想法则不同。他在刘少奇的检查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而对邓小平检查的批示，表达了更高的期望值：“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泽东10月22日上午4时。”

在10月25日到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毛泽东又公开为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某种解脱。他说：“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按照这样的批示精神，邓小平似乎不久就可以重新出来从事领导工作了。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林彪、江青一伙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就施展阴谋诡计，利用群众的名义，公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上边我们已经讲到，在张春桥的亲自策动指挥下，蒯大富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名义，1966年12月25日在北京搞了“大行动”，公开张贴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标语，喊口号，撒传单，在首都和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后各单位的大字报不断，声讨浪潮一潮又一潮。但这种假群众之名，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

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在1967年3—4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邓小平发动了又一次攻击。这次攻击的特点是由他们的高级顾问康生亲自出马。此人在中共党内以阴险狡诈，老谋深算，无中生有，善加人罪而闻名。康生在1967年4月13日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将领讲话中，先是集中力量攻击批判了刘少奇，接着话锋一转给邓小平扣上“四大罪状”。他说：“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就列出所谓的“四大罪状”，即：

（1）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主要根据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康生不顾这个报告是经过党中央集体审定，毛泽东同意的事实，硬说：“这很明显是恶毒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根据同样是邓小平在八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八大报告是这样说的：在论述了

建国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之后断定“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过程中”。这样正确的论断到了康生嘴里却成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3）“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据康生在会上讲，邓小平曾“污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从字义上看，这好像是批评当时的浮夸风，夸大成绩，粉饰缺点的话。当然，当时认为最有力的根据，就是邓小平在1962年说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康生给这句话上纲是“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说：“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关于“猫论”问题，已经有不少人写了文章，邓小平的本意是强调生产力标准，这已为大家所熟知，就勿须多说了。

（4）“反对政治挂帅”。根据主要是1966年2月，邓小平在工业交通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当时为了这个政治挂帅要落脚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人民日报》同《解放军报》打过一场罕见的社论战。《人民日报》社论主张坚持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科学实验和各项业务工作上，不能讲空话；而《解放军报》则主张政治挂帅要落实到思想革命、改造世界观上，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林彪当时宣扬的突出政治的基本观点。康生当时是支持林彪

的观点，引经据典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污蔑邓小平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是贩卖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论”、“利益刺激论”。

康生在这一次攻击邓小平中唱主角，其他人也紧跟敲边鼓。但抓邓小平的辫子并不容易，所以只能从一些生活琐事上大做文章。陈伯达攻击邓小平打桥牌，说什么“总书记带头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王力甚至说：“邓小平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如此等等。这一通鼓噪虽然很厉害，但是，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还是打不倒。

但是，江青一伙不肯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利用讨论通过给所谓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的机会，由江青亲自出面，提出同时开除所谓“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党籍的意见，并串联参加会议的一些人支持，掀起又一股黑浪。

由于毛泽东始终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有区别，邓小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支持江青的意见，又一次保护了邓小平。所以，后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的负责人谈话，谈到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时说：“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① 这话应该说是深有体会之谈。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

不过，林彪、江青一伙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邓小平赶出了北京，那就是1969年10月借战备疏散之名，把邓小平发配到江西。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邓小平住进了周总理费心替他安排的原某军区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小楼，并在附近的拖拉机厂参加体力劳动。从此，邓小平怀着忧党、忧民、忧国的心情，告别了北京，开始了江西的困苦岁月。不过这也造成了一种机会，使邓小平可以在那个特殊环境中，认真而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为复出作着耐心而周到的准备。

5. “四号人物”陶铸被迫害凄凉离世

所谓“第四号人物”特指陶铸。他原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底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显赫的党内第四号人物。

陶铸在1956年党的八大选举的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数倒数第三，位列第95位，仅在陈绍禹、曾希圣之前，说明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并不很高。“文化大革命”中突然上升，但是没过多久又突然作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位列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之一。这种突然变化使很多人迷惑不解。现在谜底已经揭开，陶铸同江青的关系在这场大起大落的政治地位变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央机构人事大变动中，从地方调到中央委以重任的只有陶铸一个人。据后来毛泽东说，是邓小平

推荐的。个中的深层原因现在尚不清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时陶铸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

陶铸，1908年生于湖南祁阳。1926年参加革命，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生，在叶挺铁军中当过下级军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后既搞过白区工作，又搞过武装斗争，建国后又长期从事地方的领导工作，经验丰富全面，有才干，有能力，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他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担任过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的副主任，是林彪的老部下。他在广东工作时多次接待过江青，双方关系还过得去。他的夫人曾志湖南鱼阳人，1926年入党，参加过湖南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属于能够跟毛泽东说得上话的人。

陶铸长期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自然也为周恩来所熟悉。还有一条，就是他同刘少奇和邓小平仅仅只有一般工作关系，而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正因为有这样方方面面的关系，调他到中央来，一个人代替彭真和陆定一两个重要岗位的任命才会顺利通过。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就这样，他成了在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调北京担任中央领导工作，陶铸的心情是矛盾而又沉重的。为什么呢？据一本名叫《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书中有这样的描写：

> 他是决心要跟毛主席继续革命，这是几十年革命经验所形成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反对

修正主义也是坚决的，他是这么想也是多次这样讲的。但他又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和担心。

陶铸时常锁着眉头，对周围的干部和妻子曾志忧心忡忡地说："前年搞运动真的是搞怕了啊。搞得国库粒米不存！再不能那样搞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①

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陶铸走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面对着天下大乱的局势，他很快就同江青一伙发生了各种矛盾以至面对面的尖锐冲突。据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文章说，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派工作组问题。面对学校和其他单位"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派工作组去领导，陈伯达在一次会上提出不派工作组，"让群众自己闹革命"的意见，陶铸当时支持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刚到中央没几天，就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邓站在一边，让江青一伙感到失望。

（2）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主持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

---

①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1]不仅如此，在发新闻照片时，陶铸认为应有邓小平的镜头，结果新华社的人搞了技术处理，把照片上的一个人隐去换上邓小平。这就是后来被江青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3）在农村和企业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周恩来主持下当时搞了两份文件草稿，都是主张在农村和企业对“文化大革命”加以适当限制，坚持八小时搞生产业余时间搞革命活动。这个文件草案当即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也遭到林彪的反对。而陶铸在当时是支持了周恩来的。

（4）在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的问题上，陶铸与江青等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个问题，成了陶铸与江青面对面尖锐冲突的直接触发点。关于这件事，下边再谈。

（5）在对待老干部的态度上，矛盾更为突出。曾志说：“有一天，他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我说：‘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2]正因为这样，他尽最大努力协助周恩来保护老干部。也正为此而被戴上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

既然有这样一系列的分歧，那么陶铸与江青矛盾的公开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直接引发冲突的是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两个造反

①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②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派头头：教育部的卢正义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对这两个人江青十分赏识，一再催促陶铸去公开支持他们，封他们为“革命左派”。而陶铸根据已掌握的材料，认为这两个人都有重大历史问题，是心怀叵测之人，一直拒绝按江青的意思去做，最后则完全闹翻了。

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和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式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1]

自这次当面冲突之后，陶铸就与"中央文革"的一伙完全闹翻了，自然也就难以再正常的工作下去。但陶铸仍在顽强地坚持着，尽力协助周恩来工作，但这样的日子也不多了。

打倒陶铸的直接导火线是王任重问题。王任重（1917—1992），河北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到北京后，很快就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合不来，很难在一起工作。心情不好，肝炎复发，不得不请假于1966年10月份去广州养病。偏偏在这时，武汉的造反派从王任重的儿子处发现他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于是造反派乘机大闹起来，说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和伟大领袖称兄道弟。加上江青等人的煽风点火，使王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

陶铸很着急，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工作，首先是治病。毛

①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8-19页。

主席对此报告作了批示，要王任重在离开“中央文革”前，由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开联席会，给王任重提提意见。领导干部调离工作前原单位提提意见，甚至作个鉴定，这本来是一种传统习惯。可这一次就非同寻常了。

1966年12月26、27日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上，不仅批判王任重，实际上的批判重点变成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康生、陈伯达重点批判，集中火力围攻陶铸。声恶语凶，帽子一顶又一顶，什么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等等，总之是说陶铸站错了立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隔了一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又留陶铸个别谈话，要陶铸小心谨慎，不要乱放炮，要他离开北京下去视察，去二三个月。

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还同江青等人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陶铸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晚上，陶铸陪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在隔壁接见湖北来的“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发表了打倒陶铸的煽动性讲话。次日，这一消息就传遍全国。就这样，权位颇高的

“第四号人物”，就被不明不白地打倒了。

此后，陶铸的遭遇十分凄惨。不断地遭批斗，折磨，有病不给应有的治疗。在中南海度过三年的囚居生活后，1969年10月又以战备疏散为名遣送到安徽合肥。一位被重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革命家，只身被遣送异地，只活了43天就凄凉地告别了人世。

6. 总理周恩来被罩“叛徒”阴影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任总理。他一直担任这一领导职位到1976年与世长辞，共26年。在20世纪世界各国的行政首脑中，恐怕也是任职最长的一位。他对中国革命贡献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他的道德人品之完满，几乎众口一词；他的领导才能之卓越，更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更无谈超越。他不但赢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心敬爱，而且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崇敬。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下边我们只列举一些他逝世后各国新闻媒介评论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驰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民主柬埔寨电台社论

世界人民难以忘怀的领导人。——日本《公明新闻》社论

当代卓越的外交家。——斯里兰卡《每日新闻》社论

赢得特殊崇敬的政治家。——伊朗《德黑兰日报》文章

一位最伟大的志士和革命家。——也门《革命报》社论

当代罕见的伟人。——马达加斯加《新闻报》文章

最优秀领导中的突出典范。

——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者》社论

一位相当于千军万马的人物。

——西德《世界报》驻北京记者鲁格

他恢复了伟大民族的骄傲。

——法新社前驻北京记者让·迪萨布隆

二十世纪有远见的政治家。 ——美国《纽约时报》社论

还可以引上很多条，但就这些已经足够了。

周恩来不仅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敬佩，而且就连他的政治敌手，也不能不对他称赞和肯定。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评论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把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对比认为："周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像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①]

但是，越是人民所崇敬的人，也就是野心家、阴谋家越忌恨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正是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推翻它，打倒它。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之始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倒周恩来，当

① 《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然积十年之功也未能如愿。周恩来如参天大树傲然挺立，而林彪、江青之辈如蚍蜉撼树，一个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老实说，要抓周恩来的辫子，攻击打倒他是不容易的。周恩来历来处事谨慎，思考周密，措施稳妥，照顾到方方面面，说话办事都滴水不漏，挑他的毛病很难。林彪、江青一伙，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条大棒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是这条大棒偏偏打不上周恩来。因为在那“五十多天”里，周恩来虽然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决定，但确有相当时间是搞外事活动，又接待外宾，又出国访问。其中，周总理应邀于6月18日出访罗马尼亚，接着又访问阿尔巴尼亚，月底方回国。

作为“资反路线”标志的，刘少奇批转北大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时，周恩来正好不在国内，没有参与。可是，不打倒周恩来，江青一伙又死不甘心，于是挖空心思查历史，终于被他们找到一条自认为是很有份量的材料，这就是1932年2月，刊登在上海几家报纸上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可是当政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不仅不组织力量抵抗日军的进攻，反而引兵向内。一方面派几十万大军“围剿”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和苏区，另一方面处心积虑地密谋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1931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给了国民党一举消灭党中央机关的机会。幸而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得到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党员钱壮飞的密报，采取了紧急措施，迅速大转移，方转危为安。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又因周恩来等采取果断措施，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

几次失败后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深知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于是，千方百计地搜捕周恩来。1931年9月，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办法均毫无效果。在这样情况下，中统特务黄凯和中统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于1932年2月，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一个化名，企图用这种欺骗手段，在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瓦解削弱共产党。

在启事刊登之时，周恩来已经不在上海。他1931年12月上旬离沪，年底已到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但是，地下党对这个启事很重视，立即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如通过史

量才、陶行知等著名民主人士的支持，在上海《申报》刊登“反启事”；散发传单，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在地下党报《实话》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是“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专门发表了一个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综上可见，这件事的经过和真相都是清清楚楚的，党组织是完全了解的。当时苏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和上海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陈云等也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在延安整风，在党的七大和八大的代表资格审查中，也从来没有人把这当作周恩来历史上的一个疑点提出来过。可是，江青一伙偏偏要抓这个问题作文章。

1967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为了“揪叛徒”而去查阅旧报纸。他们把在旧报纸上找到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送到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得到这份材料后以为可抓到了周恩来的把柄，于是就在5月17日写了一封信，把这份材料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交代的一种变相通牒。

面对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果断地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异。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①] 周恩来在亲自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将有关事实编了《大事记》，并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信和材料后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可是江青等人并不肯就此罢休。

1967年10月，江青在北京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上海市革委会办的《抓叛徒》简报中，仍把"伍豪启事"列为一条。1967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提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样，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双方都知道这件事并没有完。毛泽东提议让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把这件事讲一下，存入档案，以便让后人了解此事。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但是把录音和录音整理稿发给各省、市、区存档的问题，却由于江青等人的阻拦而被搁置。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又一次进行手术治疗之前，专门让人找来这份报告记录，亲自签名存档，

①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说明他对此事的关切和重视。因为“叛变”的帽子非同小可，如无明确而彻底地否定，始终是悬挂在一个人政治生命上的巨大阴影。江青一伙利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反总理的阴谋虽然未能得逞，但其罪恶图谋和卑劣行径是不应被忘记的。

7. 抢先“告御状”，打倒大批将帅

林彪、江青一伙借“文化大革命”之名，煽动群众“打倒一切”，冲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制造天下大乱，并趁乱夺权的种种卑劣行径，惹起公愤。

最早起来公开反对他们错误做法的，是一批为革命出生入死、建立丰功伟绩的老将老帅们。这里说的老将老帅是统而言之，他们中有些是有军衔的，如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等。有些虽然没有军衔，但也都长期担任过军队的领导。如谭震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担任过第三野战军的兵团司令，是淮海战役的五人前委之一；李先念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第五师的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原军区的副司令员；李富春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他们都是将军，只是以后转而从事政府工作，没有授军衔而已。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个人当时都是国务院的副

总理。

一谈到老同志的抗争，一提到上边的七位老将老帅，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起1967年1月和2月以“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为代表的著名抗争。当时被称之为“二月逆流”。围绕着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和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三个事关革命安危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些老同志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徐帅甚至推翻了茶几，叶帅拍桌子把小手指都骨折了，可见元帅们不可遏制的盛怒。关于这次二月抗争的事件经过，已经有不少小册子和文章，作了比较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我们这里就不需多说了。

这次抗争爆发的原因很复杂，但从一定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林彪、江青一伙有意激发造成的。周恩来在1972年12月的一封信中就曾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① 当时，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而江青一伙仍在台上，所以周恩来的信只点林彪，而未提江青。实际上“打倒老同志的局势”是林彪、江青等人合谋造成的。那么，有哪些事情特别激怒了这些老同志呢？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打倒第四号人物陶铸和阴谋策划揪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两件事外，比较突出的还有以下几件事：

（1）**冲击国防部事件**。1966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多次发生解放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以揪斗

① 转引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工作组、批判领导干部为名，冲击国防部，殴打警卫战士的事件。11月8日，以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和张家口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为主，有600多人冲击国防部，打碎玻璃窗、架上木板，踏着警卫战士的头向国防部大楼冲。为此，解放军总政治部特于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军事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在大会上讲了话，对造反派的错误行动给予严厉批评，指出这种"解放军打解放军"的事是不允许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公开讲要给他们"泼冷水"。

29日又开了一次大会，几位老帅又讲了话。陈毅说："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等等。但是，老帅们的这些忧国忧民的正确意见却被江青一伙诬为是"镇压群众"。在江青一伙的挑唆下，这些造反派不仅没有接受老帅们的意见，反而组织对老帅们的批判围攻，使他们处于困难的境地。

（2）**贺龙元帅遭揪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指使人给毛主席写信，诬告贺龙是"黑线人物"，在主持军委工作中"要篡党夺权"。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亲自找贺龙谈了话，给他看了诬告信，并表示：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

能联系群众。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1]使贺龙感到很放心。可是，林彪、江青等人并不罢休。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对在该校读书的贺龙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我可要触动他啦！"在这只黑手的挑动下，街上贴出"打倒贺龙"的大标语，造反派抄了贺龙的家。周恩来尽力保护贺龙，曾把贺龙夫妻接到自己家里住，但不能持久。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派人秘密把贺龙夫妻送到京郊山区保护起来。但不久周恩来对此也无能为力了，以致贺龙被迫害致死。贺龙这样位高功著的老革命被打倒，不能不引起老战友们的关切和震动。

（3）**陶勇被害死**。陶勇（1912—1976），安徽人。1929年参加红军。是以能攻善战著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建国后转为海军，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他因为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反对林彪党羽的意见，同他们公开斗争而受到忌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受到种种折磨和批斗。在张春桥等策划的上海一月夺权后不久，1967年1月21日，陶勇"就被凶残暴戾的敌人夺去了生命，害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2]当年陶勇只有55岁。这件事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引起解放军高级将领们的普遍关注。

（4）**张霖之被打死**。张霖之（1908—1967），河北人。是1929

---

① 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记贺龙同志遭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历史在这里沉思》（一），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② 陶小勇：《怀念与思考——爸爸陶勇和妈妈朱岚的惨死说明了什么》，《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搞过地方工作。也打过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渡江战役后转入地方工作，当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造反派不断的批斗折磨，最后竟于1967年1月22日被打得遍体鳞伤，不幸惨死。这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致死的国务院的部长。知道此事后，周恩来曾悲愤交集地质问造反派：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周总理尚如此激动，此事给别的老同志的刺激也就可想而知了。

（5）扣押地方领导同志不准来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从上海一月夺权掀起的全国大夺权浪潮中，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普遍遭到严重冲击，不仅连遭批斗，而且家不能归，连正常的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致使很多人疾病缠身。面对这种局势，为了保护一批革命的领导骨干力量，周恩来亲自开列名单报送毛泽东批准，决定把一批省级以上单位的负责人接到北京来养病休息。

可是，这件事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对。接到北京的一批老同志刚住下来，江青就指使红卫兵和造反派去冲击揪人，接连转移几个地方都不得安宁。而有一些人虽已列入名单，但被造反派揪住不准进京。例如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已列入名单，但张春桥等人竟指使造反派揪住不放，进不了京。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导火线，就是从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而引发的。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但仅此五例也足以说明，林彪、江青一伙是在有意地制造混乱和恶性事件以激怒老同志，从而引发事端，为打倒老同志，除掉他们夺权道路上的障碍制造借口。所以，江青一知道了“大闹怀仁堂”的情况，立即策划了一场“告御状”的阴谋活动。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江青没有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还有顾问康生。关于这次“告御状”的情况，过去传闻颇多，亲身参加者王力1995年有一篇名为《“文革”第一年》的回忆录发表，大概要算有关此事最详细的材料了。现摘录如下：

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我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江青这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

晚10点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引者注：即歪曲陈毅发言，说陈否定延安整风）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

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引者注：其实周恩来是希望这种有新的方针指导性重要内容的社论，事先能‘打个招呼’，以便于工作。可是，张春桥却歪曲为没送审周恩来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汇报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问题了。

这次"告御状"的主角是张春桥。这个人很善于摸毛泽东的脾气，又工于心计、善于辞令，很会挑动人们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这次他又做到了。在听取这次汇报后，毛泽东又收到林彪转来的那封谭震林的信[①]，毛泽东终于勃然大怒了。1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开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参加的小会，发了大脾气。

据王力听康生的传达，毛泽东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再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康生回来后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

① 谭震林在1967年2月17日给林彪写信，认为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表示已"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批上"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①

这件事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仅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被决定“请假检讨”，决定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这批老将老帅多次批判，而且从此之后，中央政治局不再召开会议，实际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这当然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企盼的。告一次“御状”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当然是在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个人专断代替集体领导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事。

---

① 转引自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8. 夺权大上海，作为篡党基地

上海市在中国是一个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城市。

从经济上看，它是中国最大的产业中心、经济贸易中心，轻工、纺织、服装、机电等行业均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政治上看，它是产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期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方，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争夺的地方，建国后虽然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仍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从思想文化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的地方之一，全国左翼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的中心，又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猖獗的地方，那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常常影响到全国，加上“四人帮”的主要成员都与上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地方也为志在夺取全国最高领导权的江青一伙所十分重视，作为发家的根据地。

江青要搞所谓“文艺革命”，在北京既得不到市委支持，也找不到人写批判文章，打不开局面，只好南下上海。在那里有

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又有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卖力为其服务，才使江青大显身手。第一篇指向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判所谓“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从上海发出的；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炮制“黑线专政论”也是在上海进行的。为此，江青曾在多次讲话中感激柯庆施。例如，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江青就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市委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从这个角度说，上海已经是“四人帮”的基地了，还要夺什么权呢？可是，事情总是有变化的。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突然病逝。上海改由陈丕显任第一书记、曹荻秋任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两位老同志虽然对江青由于她是主席夫人还是尊重的，但在政治思想上同江青并不一致。这一点江青后来公开讲过，当然是按照她自己的观点，歪曲着讲的。

在1967年4月1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又说：“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指陈丕显），居然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开会，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既然如此，那么，在江青一伙看来，上海的

权是势在必夺的了。

江青一伙篡夺上海党政财文大权，大体上采取了以下方法和步骤：

一是以造反为名，派人搞乱上海。

只有先把上海搞乱，才能浑水摸鱼，趁乱夺权，这个道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非常熟悉也是身体力行的。江青一伙也不例外。要搞乱上海，江青、张春桥之流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的“大人物”了，不好自己出面，只能利用群众组织。于是决定派当时在全国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子、“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去上海。1966年11月19日，聂元梓带人到上海，在与张春桥密谋后，把北京大学赴沪串联的学生组成“赴沪新北大战斗团”，与上海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先后于11月22、25日和12月11日召开3次批判上海市委的万人大会，批斗了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和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聂元梓在大会上污蔑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条黑线，中央是邓小平、彭真，上海就是“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在这三次批判大会的带动下，上海市出现了批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浪潮。市委负责人被频频拉到各单位去批斗，致使上海市委出现了瘫痪状态。聂元梓等人的活动为实现“四人帮”搞乱上海的阴谋，立了头功。江青对聂元梓上海之行的评价是“实现了交给她的任务”。[1]

① 《历史的审判》(续)，第139页。

二是扶植帮派势力，作为篡权的本钱。

这一阴谋通过张春桥对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总司”的扶植和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等人造反成立“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而实现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1966年11月6日，上海各工厂企业的造反派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30多人，在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成立的。事先江青、张春桥等人并不知道。“工总司”11月9日开成立大会，据说有一万多人参加，首都三司和上海的红卫兵三司都派人参加助威。他们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并派人参加大会，遭到拒绝。会后游行示威，示威也不予理睬。于是，这些人冲进火车站，强行登上北行列车，声称要到北京情愿。被阻在安亭火车站后，又卧轨拦车，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小时又34分钟，近百列客货列车滞留沿线，这就是著名的安亭时间。张春桥利用中央文革派他到上海解决安亭事件的机会，事先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并违反有关规定，经与王洪文等人密商后，擅自答应了“工总司”的五条要求。即:（1）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工总司”的拦车卧轨等行动是革命行动;（3）事件的责任和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工总司”以后的活动提供方便。然后，张春桥又私自向毛泽东汇报，骗得了毛对他做法的肯定和赞同，迫使上海市委接受既成事实。

张春桥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给自己



江青、张春桥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争得一个支持革命群众运动的美名，而给上海市委戴上一顶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二是扶植了反对上海市委的力量——“工总司”，并帮助它迅速壮大，成为搞乱上海、乱中夺权的主力；三是找到了一批以王洪文为首的亲信，成为自己帮派势力的骨干。

三是指使亲信策划阴谋打倒对立面。

在“工总司”成立20天后，1966年11月26日，上海出现了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名为“上海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而且发展很快，据说最多时有80多万人。他们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条，给陈伯达发特急电报，要求张春桥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

“赤卫队”同“工总司”的第一次大较量是“解放日报事件”。起因是上海市红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而且要求解放日报社在向全市发行《解放日报》的同时发送，以便“消毒”。这个横蛮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红革会”就派人占领报社，阻止《解放日报》出版。“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的做法，派赤卫队员去报社游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等口号，并与“红革会”的人展开辩论。“工总司”闻讯，立即派人支持“红革会”。双方斗争了七天七夜，最后以上海市委屈服于“红革会”的要求而告终。“赤卫队”败了。

“赤卫队”不服气，12月23日召开批判大会，强令市长曹荻秋到会，让他在“赤卫队”的八条要求上签了字。25日，“工总司”又开批判大会，强迫曹荻秋当众宣布同“赤卫队”签字的八条无效。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出现了一场更大的较量，这就是“康平路事件”。

12月27日，“赤卫队”决定派人到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找曹荻秋“算账”，同时打电报到北京，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解决问题。到28日晚，包围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已达一万多人。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向“工总司”等下达紧急指示。张春桥说：“‘赤卫队’在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他要求“工总司”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按照他的指示，“工总司”马上行动，设立前线指挥部，紧急调集人马。

到29日晚，“工总司”一派调集到康平路的已达十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到三万人。接着，在张春桥指使下，又制造了赤卫队员抄张春桥家的谎言，炮制了赤卫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于是，大打出手，制造了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最后，当然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工总司”，打败了无准备、人又少的“赤卫队”。“30日凌晨2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①]“工总司”乘胜追击，捣毁了全市“赤卫队”的各级组织，彻底打垮了这个最大的对立面。

四是千方百计排除异己，不搞大联合。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是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张春桥等人口头上也是叫得很响的，而实际上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他们并不以打倒最大的对立面“赤卫队”为满足，对同他们站在一边的其他组织，同样容纳不下，这就造成夺权过程中的多次纠纷。

1967年1月6日，在4日刚返沪的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由王洪文、徐景贤等出面借全市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实际上夺了上海市委的权。1月8日，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用张春桥的话是“经济苏维埃”夺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代替市人民政府。

接着又成立“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和法院、检察院。在这个过程中，张春桥等一派掌权，独断专横的做法，不断激起其他群众组织的反抗。在1

①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

月6日夺权大会后，上海又发生过四次其他群众组织夺权的活动。这就是：1月15日，以“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为主的夺权；1月23日，“上三司”的再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的酝酿夺权。但这四次都由于不是张春桥指示搞的，都不合他的意，而在他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下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实践，引起了很多其他造反派组织对张春桥的不满和怀疑，终于激起大规模地对张春桥的炮打。这次炮打从1967年1月28日开始，故被称为“一·二八炮打”。1月27日深夜，复旦大学红卫兵抓走了徐景贤，准备“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张春桥闻讯大为恐慌，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调动解放军包围复旦大学。但解放军了解真相后立即撤兵。这一行动极大地激怒了红卫兵。1月28日，上海市红革会召开常委会，张春桥、姚文元破例到会。这次会上出现了面对面斗争的场面，时间长达六小时。

当红卫兵质问张春桥“你三十年代干了什么？狄克①是谁？”时，张春桥面如死灰，臭汗直流。但是，张春桥的鬼点子很多。他一方面要王洪文等派人到街上覆盖“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紧急调动人马准备冲击红革会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一方面，又向北京的江青、陈伯达求援，由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发来反对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张春桥有了这份特急电腰杆就硬了，立即批示把这份特急电印刷20万份，在全市散发。

---

① 狄克是三十年代张春桥在上海写文章攻击左翼文艺旗手鲁迅时用的一个笔名。鲁迅写《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驳斥。

面对“中央文革”特急电和“工总司”调集的大队人马的双重压力，“红革会”不得不取消原定举行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徐景贤，使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半途而废。张春桥乘机严厉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因“一·二八炮打”而受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的请罪、检查）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200多人，办学习班440多人，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成终身残废。

于是，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完全落入张春桥等人一派之手。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上海市的第一、二把手，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成了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从此，上海市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

9. 蓄意鼓吹派性，策划武斗升级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承认“文化大革命”有“全面内战”的缺点。他说：“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

不过毛泽东认为：“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①]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发生原因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过也由此可见，派性武斗，全面内战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而错误判断政治形势，作出错误的决定，采取错误的方法，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把责任完全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煽动和挑唆是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但林彪、“四人帮”确实极力煽动挑唆，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记要》(1970年12月18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6)第493页。

前边已经说到，全国最早一批武斗中规模最大的上海康平路大武斗，就是张春桥一手策划导演的。不过那次武斗主要是动拳脚和棍棒，与后来动真刀真枪，长矛大刀，甚至出动坦克大炮的武斗形式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其性质相同，其在全国的恶劣影响，是绝不可以低估的。

这种恶劣作用，在1967年夏天的全国性大武斗中，表现十分明显。前边已经讲过，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林彪、江青一伙有意挑唆激化造成的。而“七二〇事件”后，他们又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

7月22日，江青在河南省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第二天，上海的《文汇报》就发表一篇文章，把“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当作正确方针传播到全国。27日，河南省省会的郑州烟厂就发生了一场大武斗，当场死10人，伤100多人。全国武斗普遍升级。

8月4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指挥了围攻柴油机厂的大武斗。抓捕、打伤对立面组织的群众650多人，致使该工厂生产停顿两个多月，损失至少在500万元以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8月7日，负责全国政法工作的副总理谢富治在一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胡说建国以来的公安、司法和检察的

理论和组织都是坏的，公开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要“把旧机器彻底打碎”。他的讲话被印发到全国。在这个错误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普遍受严重冲击，大批公安司法战线上的干部遭打击迫害。仅公安部遭迫害的干部就有225名，其中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的正副部长除谢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据全国不完全统计，各地受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共达34400多人，其中1200多人被打死、逼死，3600多人被打伤致残。[①] 结果在最需要维持公共秩序的时候，缺失了维持秩序的重要机构和力量，使社会秩序大混乱，后果十分严重。

“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谢富治讲话的同一天到外交部发表煽动性讲话。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他提出要改组外交部党委的领导班子，“以造反派为主体”。在他们唆使下，造反派封闭了外交部的党委和政治部，坚持要打倒外交部部长陈毅，使整个外事工作陷入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混乱。最终导致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周恩来及时地把此事报告了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很不满意，斥之为“大、大、大毒草”。加上对其他问题的考虑，终于下决心在8月底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稍后又隔离审查了戚本禹。“中央文革”的三个活跃成员成为阶下囚，自然狠煞了一下造反派的气焰，对全国局势发生不可忽视的

① 《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470页。

巨大影响。这是后话。

在这个紧要关头，“副统帅”林彪也亲自出马，在8月9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公开为天下大乱的局势作理论上的辩护。林彪说：

> 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

他还说：

>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甜头；（四）好人斗好人……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他发表了著名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总评价：“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的这篇讲话后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发向全党全军。中央批语说，这个讲话很重要，“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这篇讲话成为造反派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各色恶行辩护的最高辩护词，起了支持天下大乱的极其恶劣的作用。

正是在林彪、江青、谢富治、王力等人的支持和煽动下，全国的派别对立和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有些地方甚

至出现破坏交通、火烧房屋、抢劫银行、抢夺援助越南抗击美帝的作战物资等恶性事件。甚至连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当然，说都是反革命掌权，事实上也未必，但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一段时间的"失去掌握"是不满意的。

"天下大乱"是毛泽东提出的，认为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蓄意造成的。但这个"天下大乱"，应该是在最高统帅毛泽东本人的指引之下的，因此，"失去掌握"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加以纠正的。这恐怕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思维逻辑。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现在既没有全国性的统计资料，更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因此，这里很难作出全面性的描述和评论。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10. 江青为掩丑史，指挥神秘抄家

人越是声位显赫，就越注意颜面，生怕自己历史上不干净的地方被别人揭露出来，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而对江青来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虽然她趁“文化大革命”之机快速飞升，已进入中国政治的最高领导层。不过她不满足于第一夫人的显赫地位，还要当女皇，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此而不断地梳妆打扮美化自己。但她在历史上，特别是30年代前期的上海滩，确实做过许多并不光彩的事，留下许多羞于见人的丑闻。这正是她最怕人知道的必须千方百计隐瞒和掩饰的。正如一篇文章所说：

这个梦想要当现代中国女皇的野心家，对“三十年代”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她恨有些人知道或可能知道她的某些底细；她怕某些材料留在或者可能留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手里。这对她的“形象”不利，这对登上“女皇”宝座有碍。她不只在一个会上大叫大嚷“老娘不

怕”，而骨子里却恐慌得很，动不动就诬陷、猜疑有人搜集、整理她的所谓“黑材料”。[①]

因此，江青与林彪一伙合谋，利用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机会，对了解她三十年代底细的几位当年文艺界的密友，进行抄家。这些人有的被关押多年，有的甚至迫害致死。这件事一直到对林彪、“四人帮”审判之时，方真相大白。

1966年10月19日深夜，在上海发生了一起起神秘的抄家案，几位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在同一时间遭到抄家。据当时上海市委编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99期记载，这次抄家的情况如下：

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郑君里家里被抄去重要内部材料。9日凌晨一时许，约有十多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25至30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住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这些人的动作和讲话都很轻，直截了当地告诉郑要搜文件和机密文件。他们搜得非常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的全身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

① 李耐因：《上海“秘密抄家案”始末》，《历史在这里沉思》（二），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1]

其他几家被抄的情况也大体相同。黄宗英、赵丹讲得更具体。他们说：半夜12点多，突然有13个人几乎是无声无息地闯入我们家。他们也戴“红卫兵”袖章，但完全不像当时“红卫兵”造反的派头，行动诡秘、迅速，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对我们先是搜身，接着就翻箱倒柜，搜索家中的每个角落，以至每本书页。拿走所有手稿、笔记、日记、书信、相册、照片、底片、解放前的旧电影画报……总之，一切有字迹之物，片纸无存。

这些抄家的是什么人呢？原来是上海空军警卫排的战士和经过挑选的空军干部的子女。他们是奉命行事的。命令来自何方呢？来自江青。“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与叶群密谋，江说：趁着混乱，你帮我搞掉仇人，我帮你搞掉仇人。这两个坏女人当然是一拍即合。于是由叶群出面，把在上海抄家的任务交给了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打电话到上海，叫来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当面布置了抄家的任务。叶群并特别叮咛江腾蛟：“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到上海后，又把任务交给了驻沪空军某部的文化部长张彪。由张彪具体组织策划，并事先到被搜查对象住处看了地形、门牌和出入通道。于是就出现了前边讲的那种抄家情景。

当夜江腾蛟坐镇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指挥，各路人马分乘5辆卡车直奔目标，天亮前，一麻袋、一麻袋的抄家材料送到招待所的楼下。然后经过整理由江腾蛟亲自带往北京报功。叶群看过抄

① 转引自《历史在这里沉思》(二)，华夏出版社，1980年，第37页。

家材料后，表扬了他，并告诉他“上面很满意”。后来根据江青的意见把这些材料都送到林彪的住地，在江青亲自到场监看的情况下，由谢富治亲自开封，然后同叶群一起把材料送入火炉中烧掉了。时间大约在1967年1月初。

死材料可以烧掉，但了解情况的老朋友、老熟人还在，江青还是难于安心。于是，在她的授意下，张春桥利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权势，于1967年11月26日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顾而已、张瑞芳等18名在上海30年代搞过文艺工作、了解江青过去情况的人统统拘留审查。他们分别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等，遭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长时间的残酷折磨。其中郑君里和顾而已被折磨致死。

不仅对这些故朋老友，江青不肯放过，就连过去帮助过她的人，也同样不肯放过。30年代江青在上海时，租了资本家许慕贞家一间小房住。她当年收入不多，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当时在许家当女佣人的秦桂贞和江青同年，也很要好，常常偷拿东西给江青吃。感念于秦桂贞的恩德，江青到延安后，还给秦写过信，寄过照片。

可是，当江青听说上海有些红卫兵找到秦桂贞了解当年她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她便恩将仇报，立即派人把秦弄到北京，投入监狱。秦桂贞被剃光了头，每天被逼着交代根本连影都没有的什么“特务问题”，交代不了就拳打脚踢，给以种种非人的折磨。从1968年3月到1975年整整把秦桂贞关押七年之久。秦桂贞被折磨得浑身浮肿，步履艰难，不能说话，已经奄奄一息了，才被释放出狱。

以上列举的十条罪状，对于“四人帮”的全部罪行来说，只能

是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描述较之实际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但仅此，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一伙确实是罪行累累的大坏蛋，是国人皆曰可杀的野心家、阴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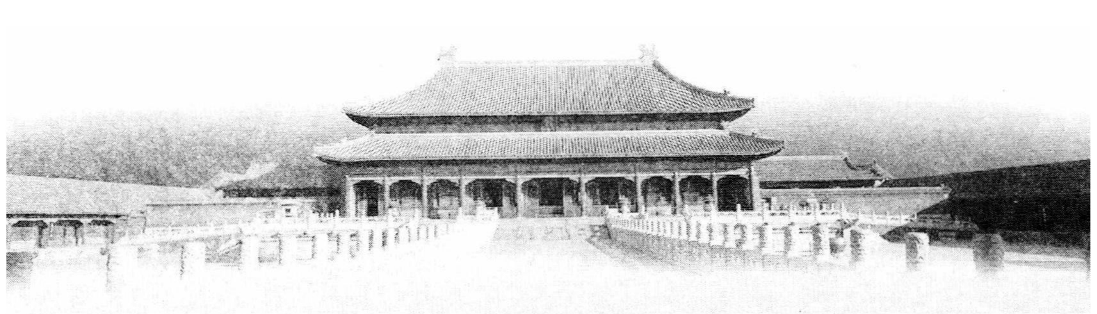


四　“四人帮”跃居权利高峰

1. 林、江两集团关系微妙

2. 林彪集团庐山失势

3. 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





从上边简要列举的“四人帮”的主要罪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罪行都是江青一伙同林彪一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犯下的。事实上这两个反党阴谋集团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不过，利益的结合是很难长久的，总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天。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必将导致两个集团的拔刀相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集团胜了，林彪集团垮了，“四人帮”终于升到权力的高峰。

1. 林、江两集团关系微妙

要想全面细致地搞清林彪同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是不容易的。不过从历史的梳理中，大致可以看出一个脉络：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分水岭。以前是互相勾结，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共做坏事；而之后是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直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势不两立。

“文革”之始，两个集团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江青要出台，缺乏适当的名义，林彪就出面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然后又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把文件送党中央批转，取得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身份，使江青有一个辉煌的出台亮相。林彪还任命江青为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批准把她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至五级。江青一伙开始时由于位卑势弱，急需“尊神”的保护，对林彪也十分尊敬，起码是表面上。在这个过程中，林彪通过江青的特殊身份，获取最高决策的信息和最高领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浅。

“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规模之宏大而闻名于世，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甚至百万人大会经常举行。而在这种群众大会的场合，两伙的人必互相配合，或在讲话中赞扬对方，或领导群众高呼口号，一方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另一方必是“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向解放军学习致敬”，气氛热烈感人。

当时他们阴谋打倒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把矛头指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共同的敌人”使林彪、江青两伙共同努力，扫除障碍。无论是操纵群众制造舆论，发动批判配合攻击，还是利用专案名义大搞逼供信，制造伪证，蒙骗中央等方面，都是配合得相当协调的。又如在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将老帅时，江青策划“告御状”，林彪就把谭震林写给他的信送给毛泽东去火上浇油。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前边已说过了。

甚至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也是江青一伙首先提议的。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以姚文元在上海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的关于进行党的九大准备工作的通报，发向全国。这份通报中，就假借群众的名义，要求大力宣传“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把这种地位明确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1968年10月，在中央一次讨论九大党章草案的会议上，江青发言要求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入党章，甚至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

仅举上边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在九大前的一段时间

里，林彪、江青两伙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林彪，特别是叶群，经常通过电话同江青互相问候，有时还互送一些小礼品或土特产之类，似乎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亲密无间的。可是，实际上，在这一段总体上以互相勾结共同作恶为主的阶段里，暗中勾心斗角，互搞小动作的事已在不断发生。

例如，1966年，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上海某军事院校的一派组织多次揪斗了林彪的干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67年邱会作在林彪出面保护下站稳脚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后，又指使这个军校的另一派组织秘密搜集、整理张春桥的“反党言论”。1968年秋，中央确定林彪手下头号干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参加该国党的代表大会，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后来由于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黄永胜才得以成行。

又如，林彪在1968年秋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中，曾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林彪的本意是要拔高赞扬“文化大革命”，赋予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上以重要地位。可是，江青等人却从极左观点出发，认为把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类比，是贬低了无产阶级，下令缩小对林彪讲话的传达范围。1970年4月，他们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大批判小组的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借批判周扬之名，指桑骂槐地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说明，江青等人对林彪只是表面尊敬，内心并不佩服。

两个集团的这种矛盾到党的九大前后，就日益明显而且逐渐表面化了。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使林彪集团的势力达到顶峰：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写入了党章；林彪集团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叶群、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进入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掌握军队实权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由林彪集团一手把持；林彪的一些亲信也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把持了一部分地方政权，真可谓权势赫赫，不可一世。而江青集团也今非昔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他们的顾问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的一批亲信和骨干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唐岐山、魏秉奎等都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双方权势的骤增，必然导致冲突增多，矛盾加剧，逐渐从以勾结配合为主，转向以冲突斗争为主。

九大前后有三件事突出标志了两个集团矛盾的加剧：一是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原本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负责，但陈伯达却抛开张、姚二人，自己起草了一份报告草稿，并征得林彪的赞成。但当讨论这份报告草稿时，却遭到康生和张春桥的反对，指责这份报告草稿宣扬了“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支持了康生等人的意见，陈伯达起草的稿子被否定了，改由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重新起草。在讨论由康生等人起草的报告稿时，陈伯达虽然讥讽这份稿子是“伯恩斯坦主义”，意即“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但因毛泽东肯定了这份稿子，也无可奈何。林彪对此事很不满意，据他的秘书说，对康生等起草的报告稿，他一遍未看，一字未改，只是在九大的讲台

上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敷衍了事。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和处理，江青等人自然也是不满意的。

其二，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双方各自策划，少给对方投票。林彪集团的一些人私下密谋少投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票。黄永胜说，要给这些“红人”“扫扫面子”。结果江青和叶群都没有得到全票。江青曾为此事大发雷霆，扬言要追查是谁不投她的票，后因毛泽东不赞成追查而作罢。这说明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已开始表面化了。

其三，九大后不久，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省视察。他在讲话时说：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地方上的负责人虽然不一定都了解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但对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还是相信的，故误以为是他传达了中央的“新精神”。

他的党羽更把他的讲话奉为圣旨，《江西日报》很快就发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抢权的文章，并编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小资产阶级的一些语录；《福建日报》也发表了贯彻林彪讲话精神的社论。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举动。对这些社论文章的矛头所向，江青等人心里当然是很明白的。张春桥私下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不过，这时在表面上双方还维持着一副团结亲密的面孔。林彪还给江青送西瓜，江青也给林彪拍摄他捧读毛主席著作的大幅照片，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当时，广大的干部包括

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委员和一般党员大多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真正了解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矛盾的人只是极少数。

但是，矛盾是难以长久隐蔽的，不能缓解就必然要爆发。不久以后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就以曲折的形式突然爆发了。

2. 林彪集团庐山失势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的庐山举行。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共有三项：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中心是第一项：修改宪法。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修改宪法呢？这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四年多了，国家主席被打倒了，国务院机构残缺不全，原来的宪法和一大批法律实际上不起作用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的。因此，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的党组织也已恢复之后，很自然地要把召开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健全国家行政机构的任务，提到急迫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为了召开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先修改宪法，使之有所依循。所以，首先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工作，两个集团的争斗也由此而引发。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筹备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问题，并将讨论意见报送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其中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是设立，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3月7日，毛泽东明确表示："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周恩来专门要列席会议的叶群把毛的意见转达给在苏州的林彪。可是林彪却叫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赞成设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一个宪法修改小姐，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五人组成，开始修宪工作。3月17—20日，又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人大和修宪问题。会上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又出现意见分歧，一批与会人员主张以设立国家主席为好。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又重申："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十分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意见的林彪，却于4月11日让秘书打电话给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三点意见，以符合国情为理由要求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担任。这个意见报送给毛泽东后，12日毛又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公开驳回了副统帅的建议。4月下旬，毛泽东还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借古喻今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毛泽东这些话已经超出了修改宪法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讨论的本来含义，有点怀疑别人建议他当国家主席是另有所图，别有用心了。

客观地说，设立或不设立国家主席，完全是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问题，是可以充分讨论的，并不涉及反党，甚至反革命的问题。一些同志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建国以后一直设立国家主席，已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因而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同时，设不设国家主席和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虽然不无关系，但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毛泽东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断，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和理由。但这在正常条件下，本不应成为一种政治是非的标准。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不正常的年代，在特殊的条件下，本属正常的问题却成为一场大斗争的导火线。

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相联系的，还有写不写赞扬毛泽东的三个副词问题。这三个副词就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提出来的，写入《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也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赞同而写入了全会公报之中，同时在全党全国广泛使用。当时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这三个副词写入宪法讨论稿的序言中。

在8月13日召开的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已经了解毛泽东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中删掉了这三个副词的张春桥，提出这三个副词可以不写了，并且说这三个副词“是讽刺”。早已对张春桥积怨很深的吴法宪立即激烈反驳，给张反扣上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帽子，并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个并不是搞理论的职业军人却同一位号称“理论权威”的

政客，争论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很奇怪，揭开看并不突然。这恰恰是两个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曲折反映。会上没有发言的陈伯达，会后却给吴法宪鼓劲，夸他“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这次火药味很浓的直接冲突终于引发了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的摊牌。

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在正式开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就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用他惯用的推崇毛泽东的手法，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讲话。他首先继续宣扬“天才论”，针对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坚持“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接着就着重讲“国家元首”问题。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了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



1970年，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

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明知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明确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却换了一个名词，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国家元首”这样的称呼，实际上又把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而且说，“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这个领导地位”是没有人不承认的。这样提出问题，等于向对方扔下了白手套[①]。对于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当场听了，没有任何表示，似要看事态的发展。

当晚，在周恩来召开的政治局委员和大区召集人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林彪的讲话很重要，要很好学习，建议再听一遍录音。这样的建议别人当然难于反对，结果就改变了会议的原定日程。24日上午，与会人员又听了两遍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分组讨论。

在分组讨论会上，林彪集团的一些主要成员，按照事先的秘密串联和约定，抢先在会上发言。本来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政治局委员级的“大人物”都是先听别人意见，最后发言的，这次是有违常规的了。而他们的发言口径一致，引用的语录也相同，纷纷支持林彪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观点。

陈伯达十分卖力，在华北组的会上发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他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

①　中世纪西方武士决斗时，挑战一方向对方扔下白手套，拾起来就表示应战，不敢拾就意味着胆怯，退让。

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为了论证设国家主席的必要性，他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的煽动下，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纷纷表示极大的义愤，有的人甚至说，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千刀万剐”。刊登以陈伯达发言为主要内容的这份华北组简报（2号），在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

林彪的老婆叶群在中南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到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的会议上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有人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这样一来，就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些人轻信了他们的发言，纷纷批判“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的人发言中点了张春桥的名，也有人不点名地攻击了江青。有些人，包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都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这种情况使林彪等人十分高兴。林彪让秘书把华北组的简报念了两遍，听得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邱会作给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打电话说：“现在可热闹了，都动起来了。”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林

彪集团以为胜券在握，实际上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忽略了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的态度。

8月25日上午，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反映了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和华北局2号简报引起的巨大反应。这次见面到底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尚没有见到详细可信的材料。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明确地站到江青、张春桥一边，而对林彪集团的活动采取了严厉批判的态度。而态度最积极又首先发了简报，留下白纸黑字证据的“理论家”陈伯达，则作为出头鸟，成为首先被点名批判的对象。

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被他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2号简报（总号6号）。毛泽东在会上气恼地说：“设国家主席的事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当面给了林彪一个警告。

当晚，周恩来主持各大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常委会的决定。这样，会议的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林彪一伙顿时慌作一团。吴、叶、李、邱立即找小组秘书收回自己的讲话，已经写成简报的也不让印发上送，完全乱了阵脚。吴法宪在10年后的供词中说：“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在山下静候佳音的林彪之子林立果，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感到“翻车了，要倒大霉了”。这样一来，林彪集团只能转攻为守，

尽量把事往陈伯达身上推，上保林彪，下保自己。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林彪集团打了败仗。

临下庐山前，叶群带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后来奉命上山的黄永胜四员大将，前往江青的住地辞行并道歉。江青也表面上缓和地说："这事都是夫子（指陈伯达）搞的，他同小张（张春桥）、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① 不过这是表面文章。第二天，林彪下庐山时，同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拍了合影，表示了继续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是大家都熟悉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不愿低头投降，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制定《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旅途中的毛泽东，企图夺取最高领导权。但阴谋败露，转而乘飞机叛逃，结果机毁人亡，葬身蒙古荒漠。这样，既与江青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又互相争斗、阴谋火并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争斗中失败了，而且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① 转引自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3. 批“左”与批“右”的较量

江青一伙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概而言之，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的道路上减少了一个强劲有力的对手，自认为是扫除了一大障碍；惧的是，他们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伙干的坏事太多，深恐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拔了萝卜带出泥”，清查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到自己的头上。为此，江青一伙费尽心机采取了各种预防手段。

一是把自己打扮成为一贯和林彪集团有矛盾、有斗争的，是受林彪集团迫害的，似乎成了反林的英雄。例如江青多次宣称：“总理、康老、春桥、文元，我们是毛主席这一派的。”而林彪一伙“他们到处放火，我们是救火队，保老同志”。这里她似乎忘记了，到处煽风点火揪斗老同志，恰恰是她们同林彪一伙狼狈为奸、共同犯下的罪行；而真正“保老同志”的是周恩来等人，因此连总理本人也受到江青一伙的多次攻击。过去她阴谋利用“伍

豪事件”打倒周恩来，把总理排除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为了“拉大旗作虎皮”保护自己，又抬出了周总理。出尔反尔，这正是江青恶劣品质的一个表现。

她甚至对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人，一位女历史学副教授，大谈什么自己曾受到林彪的迫害，甚至谋杀。她说：“林彪不仅要谋害毛主席，而且要把中央的同志全部搞死。”“我们住的地方，他们画了图，要进攻，要轰炸，一网打尽。”还说：“68年，他们两次用医疗事故要干掉我。”[①] 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中，确实提到过要把中央负责人“一网打尽”，也策划过进攻江青所居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这是在庐山会议后，林彪集团狗急跳墙策划军事政变时的计划的一部分，并非专门针对江青的；而且只是1970年8月到1971年9月一年的事，并不能表明“文化大革命”前五年，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全部关系。

至于说搞医疗事故害江青，就太富于想象力了。因为江青的医疗保健是由党中央保健部门负责的，林彪集团只能管军队系统的医疗保健工作，根本插不上手。江青所以故作惊人之谈，不过是为了骗人而已。

二是极力反对批“左”，竭力强调批“右”。

众所周知，江青同林彪一样，都是利用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而飞黄腾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高峰的。林彪虽然在搞个人崇拜、突出政治等方面有些挖空心思的独到提法，但到底不是专门搞理论工作的，没有张春桥、姚文元、特别

① 1972年8月，会见美副教授威特克夫人的谈话。

是康生那么多理论创造，没有那么多大文章。正是靠了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一系列大批判文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才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人，最高指示的官方阐发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倾理论是他们赖以立命存身的命根子，飞黄腾达的最大资本。因此，他们特别害怕批"左"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要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仅仅批判他们的反革命军事政变计划和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罪行，就显得不够了。批林整风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林彪宣扬的一系列谬论。而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他们的罪行，就必然要批"左"，这可以说是运动发展的客观逻辑。

林彪一伙策划反革命军事政变并叛国外逃的事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他大病一场，并开始重新审视了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他在总体上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纠正了已经觉察的部分错误。如指示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某些冤假错案。在1971年11月14日讲话中，毛泽东肯定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实际上为陈毅恢复了名誉。又如1972年8月14日，他对邓小平来信作了批示，指出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

子”；“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等等，为邓小平的复出打开了绿灯。

还有，他先后批示为陈云、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杨勇、廖汉生、林枫、叶飞、吴冷西、苏振华、郭化若等一批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平反改正，或者从关押中释放，或予以解放，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他还批评了一些“左”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做法。这些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批林整风中，对纠“左”采取更为积极而坚定的态度的是周恩来为首的一批老同志。他们首先抓紧整顿领导干部的队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陆续撤换了一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造反起家、表现很坏的省区负责人，如浙江省的南萍、陈励耘，江西省的程世清，山东省的王效禹，黑龙江省的潘复生，贵州省的李再含，山西省的刘格平等。同时，抓紧对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如1971年11月，派人到贵州，找到被流放到该省农村的贺龙夫人薛明，准备为贺龙冤案平反。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陈正人和曾山因缺医少药、治疗不及时而不幸逝世的事件，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让50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到北京检查身体，从而使许多流放外地的老干部得以重新回到北京，有的还重新安排了工作。

为了纠正由于极左思潮而对老干部产生的错误认识，周恩来还指示《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一篇恢复和落实党的正确干部政策的社论，名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申了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左”倾路线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方针而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对现实有强烈的针对性，又使江青等人难以反对。这篇社论中强调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平反一些地区性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整顿和恢复被错误砸烂的公检法机关；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制止对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种种极左行动等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也作出了积极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对于任何纠“左”、批“左”，江青一伙都是不赞成的，都是极力反对的。但是，上边提到的这些在干部政策、冤假错案、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纠“左”，一方面是牵涉到林彪集团的罪行，江青一伙要与林彪集团划清界限，扮成一贯反林的面孔，当然不便于出面反对；另一方面，这些纠“左”的举措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或批准的，一贯宣扬自己是忠于伟大领袖的江青一伙，当然也是不好出面反对的。不过，他们心里对批“左”是极端不满的，早已在那里挖空心思，窥测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找到了适当的名目就会立即出击的。这样，纠“左”当中的斗争和曲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一次斗争发生在“教育革命”问题上。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负责人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本拟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因姚文元反对而发表于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张春桥、姚文元立即指示《人民日报》拒绝转载这篇文章，而且通过上海《文汇报》，利用群众反映的名义向中央报送情况，随后还发表多篇文章攻击周培源。张春桥还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矛头直指周恩来。

第二次是批判无政府主义问题。

周恩来多次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求他们把极左思潮批透。他说："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李先念、华国锋等人在接见东北的一些工厂负责人时，又提出"无政府主义不反不行"。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的理论版上，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揭露林彪、江青等"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的错误做法。虽然名义上是批林彪，但也触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

姚文元当即批评《人民日报》："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立即密令上海《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并整理了一份纪要报送中央。《纪要》中猛烈攻击了《人民日报》的上述文章。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又在《人民日报》社内搞了一场所谓"批邪"的运动，围攻了组织发表这些文章的理论部负责人。

第三次是在林彪集团的性质问题上。

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联合给中央送了一份报告，建议召开一次外事会议，“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这份报告在党中央政治局传阅时，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周恩来对这份报告批示“拟同意”。而张春桥却批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如果说，张春桥说话一贯拐弯抹角，那么江青就毫不掩饰了。江青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分歧如此明显而尖锐，那么只能请最高领袖毛泽东去裁决了。

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大概是毛泽东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考虑的吧，他认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因此，“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这就公开支持了江青一伙，而否定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1973年两报一刊的《新年献词》里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认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此后不能再批极左，而只能批极右。这样就从总的政治理论层面上阻碍了批林整风的深入。而且由于毛泽东的指示，使江青一伙在同周恩来的较量中成为胜利者，使他们又重新神气起来，继续大干祸国殃民的坏事。

4. 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江青一伙从“文革”开始就拉帮结派，祸国殃民。但江青加张春桥、姚文元还只有三个人。因此，要讲“四人帮”，就必须要讲王洪文。王洪文被从上海调到北京党中央，时间是1972年9月7日，名义是学习。这本来是伟大领袖的特殊恩宠，可是王洪文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却很不理解，很不情愿。王洪文到京之初，没有安排什么具体工作，他自己给上海的同帮打电话，表示要看很多书，不习惯，也感到“很寂寞”，以致有人认为是他犯了什么错误。为此，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代会的一些委员时，对王洪文的铁哥儿们作了一番解释。他说：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

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

张春桥的这番话，大体上是可信的。就是说，王洪文是被毛泽东考虑作为接班人而调进北京培养的。林彪叛党外逃机毁人亡后，毛泽东失去了九大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本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领导人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样也就不存在谁接谁的班的问题。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却发生了领袖个人指定自己接班人的事，这是很不正常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①] 但是很遗憾，毛泽东不信任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举的接班人刘少奇，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却选择错了。

不过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这种错误做法，仍是自己选择接班人。只是在具体办法上有所改变，就是多考虑几个对象。在调王洪文到北京之前的一年已从湖南调华国锋到了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197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三人之中，王洪文名列首位，又最年轻（1934年生）。而华国锋是1921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7页。

年生；吴德是1913年生。年龄上王洪文有很大优势。名义上虽然还有点含糊——只是“列席”，但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意图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更能体现毛泽东意图的是让王洪文参加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担任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而老资格的有很高威望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却成了王洪文的副手。这样一种排列和组成方式，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同时，也决定了由王洪文向党的十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大家都知道，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代表着相当高的党内地位。

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的是刘少奇，八大作修改党章报告的是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的有威望的老革命家。九大没有人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只分组审议党章的修改草案。而十大，这个光荣的任务却落在王洪文这样的人肩上，这既令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感到惊奇，也充分领受到毛泽东又一次选定自己接班人的意图。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党的中央政治局和代表大会都是接受了的，从而给了这个个人选择以合法的外衣。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名单上，列首位的是毛泽东，第二位是周恩来，第三位便是王洪文，他排在康生、叶剑英之前，张春桥担任了大会秘书长。而在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席台上，在居中的毛泽东两侧，一边是周恩来，一边是王洪文。于是，王洪文成了国内

外瞩目的人物，被某些新闻媒介称为“正在上升的耀眼的星”。

据说，在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还是有些代表不顾政治高压，勇敢地对王洪文提出反对意见。如提出安亭卧轨拦车，破坏铁路交通能算“革命行动”吗？在上海组织二十多万人搞大武斗，用暴力“踏平联司”合适吗？这样的造反司令能当党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吗？但是，在那种领袖一言重过九鼎的氛围下，加上上海同伙的极力辩护赞颂，王洪文还是顺利地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成为名正言顺的党内第三号人物。

江青等人极力利用党的十大的机会，把一大批造反派拉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包括文化部的于会泳、体委的庄则栋、上海的周宏宝、福建的陈佳忠、天津的王淑珍、山东的杨坡兰、河南的卢忠阳、安徽的吴从树等都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有的还是刚刚突击入党的新党员，比如朱克家。朱克家本是上海到云南插队的知识青年。被封为“反潮流”的典型。他本不是党员，姚文元得知后说：“这样的人不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一句话朱克家就在1973年4月被突击入党。在4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大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样就扩大了“四人帮”的势力。

王洪文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立即与已经成为常委的张春桥、委员江青、姚文元四个人结成一种关系极不正常的小帮派。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统一口径，互相声援，在党的最高领

导机构中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例如，1974年初有人写信给江青，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队的工作。按照党内工作的惯例，应该把信转送给毛泽东或叶剑英。可是江青却把信转给了并不分管军队工作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并且说“如果真像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张春桥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是要烧一烧。”王洪文也立即圈阅，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就派人去解放军总参谋部去“放火烧荒”。

又如，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来信送到王洪文手里，信中对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汪东兴提了一些意见。按照惯例，这样的信应首先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可是，王洪文却把它送给了江青。王洪文批示：“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阅示。”而当时只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却坦然地接受了副主席的“请示”，并对涉及副主席和委员的来信，擅自批示“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王洪文当即照办。可以不送中央主席，不送常委，也不在政治局内传阅，但却一定要给自己的同伙知道。这种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不是恰恰表明了四个人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吗？

十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21名，候补委员4名，共25名。从人数上说，“四人帮”并不是多数。但委员中有些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如朱德、刘伯承、董必武等，已不能过问许

多事情；许世友、韦国清、陈锡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是李德生）在外地担任负责工作，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有些委员刚从地方上破格进入中央领导机构，水平不高，经验不多，在政治风浪中常常随风倒，有意无意地支持了江青一伙，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这样一来，一位副主席，一位常委，两位委员结成的帮派，加上身为中央副主席的康生的支持，就具有了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

特别是在江青利用特殊身份获得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就更加显得气势汹汹，权势熏天。不但一般党员干部对他们无可奈何，甚至周恩来、叶剑英等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对他们一时也难以有效扼制。因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这确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对中国的政局和前途发生广泛影响和严重危害的大事。

不过，物极必反。在党的十大后，“四人帮”的势力发展达到顶点。随着权位的增大，他们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开始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猖狂活动。这样一来，也就为他们自己的彻底灭亡准备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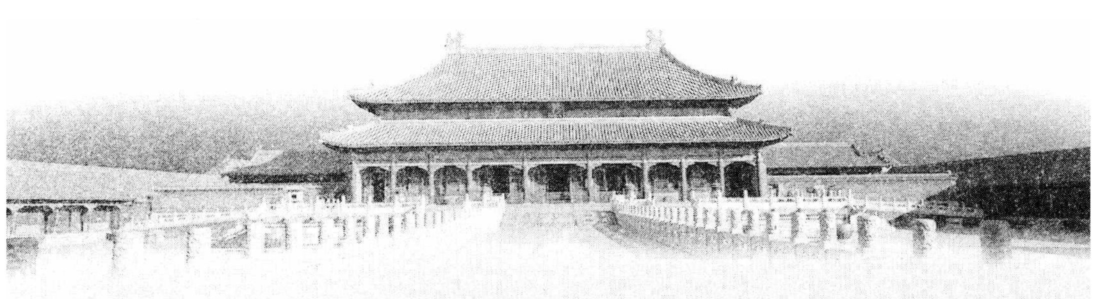
五　领袖辞世 女皇梦破

1. 批周公，颂“女皇”

2. 邓小平的艰难复出

3. 从批《水浒》到批邓

4.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





当江青一伙认为自己的势力已经在党的十大得到巩固和增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为夺取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而猖狂地开始了各项阴谋活动。但是，他们自以为是通向权力宝座的途径，却一步步地导引他们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历史耻辱柱。

1. 批周公，颂“女皇”

十大以后，江青一伙搞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利用毛泽东把林彪的思想理论根源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导师，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思考，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批林批孔”的大浪潮，把攻击的矛头露骨地指向他们认为是夺权道路上最大障碍的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前后的几次谈话中谈到了批孔的问题。如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讲道：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并当场念了他所写的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接见埃及副总统莎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后，立即投其所好，指派一些人到林彪家，从林彪让别人给他摘抄的一些中外名人语录中，找出一些孔子和历代儒家的语录，编成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送给了毛泽东。材料前边由江青同王洪文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们的这一建议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江青指使人编成的这份《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下发。中央的批语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江青一伙立即大肆活动起来，把"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周恩来等多方努力稍有好转的局势，又大大恶化了。

江青一伙除了指使党羽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一些批林批孔的文章，在社会上制造舆论之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擅自在北京召开中央机关的万人大会，作煽动报告，直接鼓响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台锣鼓。这就是1974年元月24和25日分别召开的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两次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矛头

就十分明显地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同志。

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而是江青擅自下令召开的。会上由江青的两个心腹干将——迟群和谢静宜作主讲，江青盛气凌人地不时插话。他们指名攻击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抓大事，辱骂总政宣传部负责人关于部队如何搞批林批孔的讲话是“屁话”，揭发批判中共中央联络部领导人，还煽动群众反“走后门”……江青指手画脚，点过这个人的名，又批另一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姚文元长篇插话，大批所谓“中庸之道”。而周恩来在大会上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令到场上万名干部感到莫名其妙，气氛紧张而压抑。

参加大会，并被江青点名站起来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因受胁迫要他揭发周恩来，受到很大刺激，会后不久就住进医院。《郭沫若传》中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现摘录部分如下：

> 1月25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的，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①]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像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吞噬……（会后），周总理派

① 据笔者亲眼所见，在大会上点名让郭沫若站起来的是江青。主持大会的也不是“造反派小将”。

人来探望，对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2月10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沫若，逼他作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周总理。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跟她答话。这场疲劳轰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江青才走。沫若感到五中如焚……待住进北京医院，他已烧得神志不清。[1]

关于"走后门"问题，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几句："走后门"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比较突出的不正常现象，涉及面很广，但突出的是"走后门"上大学。上大学本来是青年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阶梯，也是他们的父母亲期望子女成才立身社会的一件大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课闹革命"，不再招生，堵塞了这条重要的成长之路。于是，一时之间，当兵参军成为许多人热衷以求的事。但军队是一种社会特殊组织，而且容量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百业萧条，城市各种职位的容纳量很少，青年人只能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去。可是，从1970年开始，随着"斗批改"的进行，一些大学又陆续被批准复校招生，给了青

①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60-462页。

年人以极富吸引力的希望。但当时的招生数量少于"文革"前，而生源却已积累了五六年之多。大批青年拥向大学门口的是一座狭窄的独木桥。加上当时又在"教育革命"的旗号下，赶走了严格考试这一公正的把门官，搞什么"群众评议，组织推荐"之类弹性很大的办法，就使"走后门"这一不正常办法顿时盛行起来。

有些原来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这时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原来被株连的家属子女这时也要求获得适当的补偿，有的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了大学。这种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送子女上大学、参军等问题，必然引起广大群众比较强烈的反感。"四人帮"就是抓住了部分群众的这种反感情绪，提出"反走后门"问题，以打击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在1月25日大会上，江青等就利用了一封军队高干子弟上大学后的来信，作为煽风点火的武器。江青还在稍后的一次会上，指名攻击了叶剑英，迫使叶帅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说明事实的真相。毛泽东及时作了批示，明确提出"反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指出"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才使"四人帮"煽起的这股邪火，暂时平息下去。

江青一伙一方面胁迫一些同周恩来熟悉的老同志出面揭发，这方面当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另方面又指使自己的写作班子，大搞含沙射影的攻击污蔑文章。这方面最突出的恶劣典型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孔丘其人》，发表于1974年《红旗》杂志第4期。关于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中共北京大

学党委会搞的一份《"梁效"部分反党文章清查材料汇编》中，有如下记述：

> 这篇文章是由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亲自点题授意，"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坐镇大批判组指挥，最后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审定抛出的。这篇黑文中恶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是"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点文章之一。

当时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四人帮"还有所顾忌，不敢点周总理的名字，于是就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个代名词"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而且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如果说，在公开发表文章时，"四人帮"攻击总理还不得不有所隐讳，拐弯抹角，那么在私下谈话中就露骨多了。

1974年6月11、14日，江青先后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见两校大批判组（梁效、柏青等）和中央党校写作组（唐晓文）成员时提出："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主观命题，要写作班子为她论证。提出这样的命题要干什么呢？目的就是批儒家，赞法家，批宰相。他举出秦朝的宰相李斯，说他是儒家，"犯错误，有两个污点"。又举出一个刘邦的妻子吕后，说她"是法家，是伟大的女政治

家”。“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一个儒家的宰相“有污点”，一个皇后是法家“伟大”，江青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就十分清楚了。不过只讲古代的例子，她还怕有误解，又明确授意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在的儒。现在的儒，除林彪、陈伯达不提了……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儒了吗？”

6月19日，江青带着她的写作班子的一些人，到天津市和宝坻县小靳庄活动，一路大讲儒法斗争。她露骨地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现了不少儒。”她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大儒。”她惟恐别人对她的意思了解不清楚，还特意指使亲信宣读一份吹捧她是“激进派”，称周恩来为“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她要批的“党内大儒”。

在小靳庄讲话时，江青还胡说：“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还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一语双关地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她在天津还要服装设计人员按她的意图设计什么“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大概是为自己登上“女皇”宝座设计的大礼服吧！

心有灵犀一点通。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对江青讲话的两大要点：批儒家，批宰相；赞法家，颂女皇，心领神会。于是，一篇又一篇这样的黑文章就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并受到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媒介广为传播。我们不妨举几篇臭名远扬的大批判文

章为例：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署名梁效，同时发表于1974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和《教育革命通讯》第8期。这是江青授意，迟群、谢静宜亲自指挥而炮制出来的一篇重头文章。江青在6月14日接见两校大批判组的人时说："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呢？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重臣为她所用，就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广得多。当时有20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大批判组就按照这个基调，称颂武则天是"一个蔑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登上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宝座的历史人物"，是"忧劳天下"的"明王"、"圣后"，"顺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

《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北京日报》1974年8月17日。这是替江青的主观臆断"儒家卖国、法家爱国"挖空心思作论证的坏文章。文章歪曲、篡改历史，胡说"在二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常常是同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爱国，儒家卖国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文章说"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王安石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从司马光到林彪无一不是卖国投降的无耻之徒"。因为司马光曾担任过类似宰相的职务，他们又在批宰相上花了不少笔墨。涉及宰相就大批一通，是"四人帮"影射史学的一个并不光彩的特点。

《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署名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1974年9月8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是根据江青6月14日讲话精神起草的，写成后又几次送江青、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抛出的。它以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表面批判秦朝的丞相李斯，实际上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文章说，在秦始皇逝世后的关键时刻，“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本可以搞掉赵高这个反革命狰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的家伙，制止他们的政变阴谋，但却不够坚决，屈服于赵高的压力，它反映了李斯的动摇性和书生气，这是李斯一生中杀害韩非之后的又一污点”。说李斯“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的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文章中还别有用心地吹捧吕后说：“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造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如此等等。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发表于《红旗》杂志1974年第10期。这是一篇姚文元授意，署名梁效，直接为“四人帮”登台组阁造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开始起草是六月份，按照姚文元关于组织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经验的文章，以回答这个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有什么意义”。

文章有了初稿后又几经修改。到九月，中央开始筹备四届人大会议，酝酿政府的人事安排，于是这篇文章就在十月份抛出了。文章总结和鼓吹的是什么历史经验呢？就是要由“法家领导集团主持中央工作”。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

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这和“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文章以吕后暗比江青，以“法家领导集团”暗比“四人帮”，吹捧说：“刘邦死后，实权掌握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的吕后手里，在她掌权的16年中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文帝以后的几代，也都重用像晁错、主父偃、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在整个七代中得到坚持。有了掌握在法家手里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就不怕复辟势力起来造反。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迅速削平。这是汉代一条十分值得注意的经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防止“清君侧”的问题。因此，它已不只是反对周恩来，而且实际上反对毛泽东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政府工作的意图。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四人帮”煽动、组织、指挥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口诛笔伐表面上热火朝天，确实也制造了一些混乱和事件，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当时并不能决定全局。关键还要看毛泽东的态度和决策。

毛泽东是支持“批林批孔”的，但是有自己的考虑和限度。特别是在挑选接班人和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新一届政府这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头脑清醒，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他不仅根本不考虑江青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而且尖锐地批评了“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且明确批示，叫江青不要参加组织政府。毛泽东把重病中的周恩来请到长沙，当面委以组织政府的重任，并要

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就使“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反对周总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没有能够得逞。但“四人帮”并不甘心，斗争仍在继续。

2. 邓小平的艰难复出

邓小平复出和恢复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的问题性质有区别，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泽东这个意思传递了出去。

邓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作了批示。信中明确表示：

>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

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①

毛泽东的批示，话讲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时候强调邓小平的优点，为他评功摆好，绝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态。周恩来立即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复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复阻挠。不过毛泽东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难以长期阻挠。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时距毛泽东的批示已经半年多。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邓小平回京后参与了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负责外事方面的工作，而在工作中也不断受到江青一伙的刁难。例如，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派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呢？中央政治局为此曾专门开会研究。有的同志提议由邓小平领队，这从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看，也是适合的。因为按一般国际惯例，出席这种大会的代表团长应高于外长。但周总理已患重病，不宜出国远行。那么理所当然的应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因此，毛泽东选定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可是，江青却顽固地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国。3月22日，外交部送呈《关于参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辑，第707-708页。

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当夜，江青就把外交部负责此事的女干部王海容叫来，对外交部无端指责，强令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人选。遭外交部拒绝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邓小平任团长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只好请毛泽东裁决。

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①] 这样，江青才停止无理取闹。4月份邓小平率团出席了联合国特别会议，并在这个世界性的讲坛上，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邓小平努力工作并卓有成效，不仅不能止息江青一伙的刁难和反对，反而使他们越加感到这个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而深孚众望的小个子，是他们夺权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特别是随着四届人大的加紧准备和毛泽东日益明确地倾向由邓小平来接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矛盾日益尖锐化。一场由"四人帮"策划已久的冲突终于爆发了，题目是江青一伙精心选择的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一艘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造船工业还不甚发达，因此，能制造出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还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过也还有些核心机件不能完全过关。因此，在出航的时间上曾有所推迟，引起了一些矛盾。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还特别选派了一位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69页。

有二十多年远洋航行经验的，名叫李国堂的交通部干部，到船上担任副政委。这本是一番好意，可是自认为上海高于全国的张春桥等人却很恼火。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是给罗马尼亚运送去万吨大米。1974年5月4日从上海起航，经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绕行风大浪高的好望角，经地中海，航行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察。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历时150天，航行3.2万海里。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书的成绩。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拿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打击邓小平的一枚炸弹。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风庆轮”“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的同时，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国堂副政委进行批斗，同时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所谓航行中问题的内部《动态》上报中央。

在做了这些手脚之后，“四人帮”就倾巢出动大举进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这份内部《动态》上气势汹汹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交通部却被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

张春桥马上响应并上纲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张春桥批示说：“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当然不甘落后，也紧跟着批写了一大段：“基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抗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这些帽子不可谓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纲上线不如张、姚，但整人的办法却很多，他下令：“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一天，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如此严重而尖锐的批示，是很不寻常的。批示名义上是对着李国堂和他所在单位交通部，但李国堂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视吗？很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谜底三天以后就见分晓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江青借机发难，拿出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当面质问邓小平为什么不批示，不表态？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驳：每次政治局会上都是这个态度，你这样搞，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这样气氛下当然难以冷静地研究任何问题，邓小平起身离开了会场。张春桥马上乘机挑唆：“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也大叫：这“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的冲突，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开会。一个政治局委员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开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正常的。

据王洪文和姚文元后来的交代材料，在这个小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气，不支持新生

① 此问题可参照下边的背景材料。

关于造船和买船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从1950年到1964年，自造远洋船共7艘（其中万吨2艘，万吨以下5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外贸运输主要靠租用外国船，支付大量外汇租金。因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必须造船与买船并举，迅速扩大中国的远洋船队。交通部和外贸部等的报告得到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到1965年，中国从国外购入旧货船18艘，新货船4艘，资金由香港中国银行贷款解决，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971年到1973年，国务院又批准交通部利用贷款共4.1亿美元，买入外船198艘，载运量255.4万吨，营运净收入2.05亿美元。

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利国利民，可是却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上海造船部门提出，用买船的外汇贷款，进口设备，材料，变国外买船为国内造船。1974年3月，李先念对此作出长篇指示。指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不排除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的运费就要3亿多美元，数目太大。""特别是利用我香港银行吸收的部分闲置存款，买一些船是划得来的。"李先念的指示，得到邓小平、李富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赞同。

可是，"四人帮"却蛮不讲理，继续利用一些所谓群众来信，反对国务院的正确决策。王洪文利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把一些来信批给中央领导传阅。王洪文还说，从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这样就引发了上述的风庆轮事件。

（主要资料依据：高远戎、刘学礼：《李先念：共和国二十六年的副总理——纪念李先念诞辰一百周年访谈录》，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事物。”姚文元则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经过整夜密谋后，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了。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报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开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避开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个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损害。

这次告状的情况，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给特别法庭写的证词里面谈到的是这样：

王洪文开始时礼仪性地询问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之后便开始告状。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围绕“风庆轮”问题发生争吵的经过，污蔑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王洪文又污蔑攻击周恩来等有密谋。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

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往来这样频繁，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在汇报中，王洪文也没有忘记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分别作了一些吹捧。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汇报，反而告诫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使“四人帮”告状的阴谋未能得逞。王洪文虽然当面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找总理谈，按主席的指示办，但回到北京还是先到钓鱼台找江青等人汇报并商讨对策。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对陪同外宾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又给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掀起政治风波的阴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1980年王洪文在狱中交代说：长沙告状的“目的就是在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是恶人先告状”。但是，这次告状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搞臭邓小平，反而使毛泽东进一步识破江青等人的野心，进一步坚定了重用邓小平的信念。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到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事，两人作了生动的对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奉命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问题。先后谈四次。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满面羞红地承诺："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还按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旧。

毛泽东肯定并赞扬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指着王洪文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党的十大上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对王洪文的信任，而把党、政府和解放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过："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笑着说："没有办法呢。"

毛泽东还当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毛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不过，毛泽东认为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林

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后面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明他对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敌对的力量。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长沙谈话的要点，并获得到会人员的一致同意。江青等人也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反对。根据会议的决定，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准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员，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以邓小平为首的12位副总理。江青提议的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意见被否决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失败。

在短短二十几天里，邓小平接连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既是客观形势的急迫需要，也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所向，又说明在紧急关头，党的领袖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就奋勇担起领导全党的重任，把历史推进到一个全面整顿的新阶段。不过“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只是暂时的受到扼制，不得不待机而动。这样，就必然要爆发更加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3. 从批《水浒》到批邓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成绩卓著，众所公认，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最好的一年，值得在国史和党史上大书一笔。但这不是这本小书的任务，只好从略。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公开批评，“四人帮”也是比较收敛一些的。但这决不表明“四人帮”已甘心失败，当然更不可能是改邪归正，而是待机而动，一有机会他们就乘机干扰捣乱。在1975年前三个季度，全面整顿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时候，“四人帮”就已经制造了两场全国性的比较大的风波。

一场是反所谓经验主义。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付以重托，但对他并不十分放心。所以在1974年底，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谈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又特别谈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前后关于这个问题的多次讲话整理成为一个文件，于1975年2月18日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形式下达。

《通知》说："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稍后，又下达了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表面看，这似乎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是指导全党干部的学习问题，而其中却包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从一定角度来说，等于是画出了一个大框框，告诉邓小平只能按照这个大框框和规定方向路子走，不准越雷池一步，当然更不准改变，否则就是"变修"，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因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名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这就给了他们假借学习宣传毛泽东指示以贩卖私货的机会。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以如何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为名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他含沙射影地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说什么"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此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成为"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等同志努力率领群众搞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口

号。在这个讲话中，张春桥还利用毛泽东1959年的一个批示，别有用心地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口号。毛泽东在那个批示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在当时，谁又敢说毛主席的话已经失效了呢？

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由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这篇文章除了从“左”的方面歪曲阐释毛主席的指示，大讲“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等问题外，也与张春桥相呼应，强调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江青这时也忽然热心起来，又是给所谓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六厂二校中的新华印刷厂打电话，又是对两校大批判组发指示，要他们注意，“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她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一时之间“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大量涌现，充塞报刊的重要版面，有的甚至在头版搞通栏大标题。不少地方和单位召开什么“反经验主义”的经验交流大会，一时之间造出颇大的声势。“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借反经验主义之名，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向刚刚重新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同志。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1975年4月23日，他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请示报告》上

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指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5月3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了话。他指出：江青等犯有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等错误，要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不过在讲话中，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文章他是听别人读过的。[①] 文章中讲了反经验主义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就是说，毛泽东虽然批评搞"四人帮"，但矛头主要是指向江青，对张春桥还是有意加以保护的。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对江青等人进行数次严肃的批评。但江青等人采取敷衍抵赖的态度，事情只能适可而止。毛泽东的批评和政治局的会议，使"四人帮"刮起的反经验主义之风很快被刹住了，从而为全面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另一场是利用评《水浒》掀起的风波。

《水浒》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战争的古典小说。评《水浒》，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搞文艺评论，其实是以评小说为名而搞政治斗争。事情的起因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奉命去给毛泽东朗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她借机向毛泽东请教对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在评论到《水浒》时，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

① 毛泽东当时因患白内障，不能看文件，只能听别人读。后来动过手术之后，又可以看文件了。

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如此等等。当时，这是属于个人之间交换对文艺作品的看法，毛泽东并没有讲要搞什么运动之类的话。

江青等人很快得到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稿，认为这是借题发挥进行反扑的极好机会。

8月13日毛泽东谈话，第二天，姚文元就写了一个如何贯彻这篇关于《水浒》的评论的请示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得到了批准。15日，姚文元就下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写作班子，撰写社论，准备文章。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发表经姚文元修改的《红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同时发表了御用写作班子的长文《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号召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评论。接着，他们的写作班子陆续抛出各种文章，在全国报刊广播中掀起一场评《水浒》的喧闹。

江青一伙如此卖力地大批《水浒》主要人物宋江的投降主义，对一个千年前的小说人物大张挞伐，目的是为什么呢？当然不是他们有嗜古之癖，而是借古喻今，为他们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的阴谋服务。

这个反动目的，江青1975年9月17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的讲话中说得十分露骨。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

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去了，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这就是说，江青企图用“投降派”的帽子和“架空毛主席”的罪名，把邓小平和一大批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统统再次打倒。这次评《水浒》实际上为后来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上的和思想上的准备。

如果说这两场风波显示着一种不祥的预兆的话，那么，确实在不久以后，1975年11月开始，一场新的错误的大风暴又席卷了全国，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本来是毛泽东自己在一个危难的时刻亲自挑选了邓小平，赋予重任，并给予较高的评价，给予了一定的信任和支持。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有口皆碑。那么，为什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又突然发动一场运动把他再次打倒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定，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确实是抓住了要害。而使毛泽东作出这样判断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一件是对毛远新的挑唆作用不可低估。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由于其父毛泽民牺牲，小的时候他是在毛泽东身边度过的，同江青的关系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著名的造反派

头子，以后又当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5年10月，他参加中央慰问团到新疆，回来后就留在北京，成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当时毛泽东年事已高，重病在身，活动不便，主要靠毛远新汇报情况。毛泽东当时对江青是有相当警惕的，而对毛远新则是相当信任的。可是毛远新却同江青接触很密切，听信了江青的话，“同邓小平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正是利用了这种方便条件，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很多邓小平的坏话。根据后来毛远新写的交代材料，他主要向毛泽东汇报了如下问题：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也不大提了。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主席一些决策，主席一些很重大的指示，大家都说好，说重要，但没有认真讨论。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学习，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怎么批，关于《水浒》

的评论怎么贯彻？长此下去，不是政治局不议政了吗？

毛远新的这些汇报，每个问题都围绕着"文化大革命"，每一条的矛头都针对邓小平，这就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因为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当时就表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信告迟群和谢静宜，揭露了他们在清华大学的许多错误做法和问题。迟、谢二人原来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一个是中央警卫局的科长，一个是机要秘书，是毛泽东亲自派他们下去抓典型的，是他信任的人。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毛让秘书先放着。10月又送来第二封信。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认为代表了要对"文化大革命"算账的错误态度。而把刘冰的信转送给毛泽东的又是邓小平，这就使毛泽东加深了对邓的误解，认为邓"偏袒刘冰"，产生了误断，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于是，这封信成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通过一个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又遭到邓小平的婉言拒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下决心再次打倒。关于这件事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有如下表述："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

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合，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展，“四人帮”立即重新猖狂起来，全国形势也立即逆转。“四人帮”不仅利用掌握的传媒工具，大造舆论，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批“走资派还在走”，而且对一些在全面整顿中表现积极的领导干部，如铁道部部长万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残酷批斗。其中，周荣鑫②在连续接受五十多次批斗后，不堪折磨昏倒在批斗会上，以致含恨去世。

江青的猖狂得意之态，从她1976年3月2日擅自召集12个省区负责人会的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在会上大骂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号召大家“要共同对敌，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6-427页。
② 周荣鑫（1917-1976），山东人。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建工部副部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等职。

对着邓小平”。

江青这些胡言乱语有什么事实证据吗？江青在讲话中确实说了一件事。不过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性质，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江青说：“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幸亏“四人帮”很快垮台了，不然装在大庆的化肥设备再拆掉，要造成多大损失！江青还表示自己的决心说：“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光荣之至！”

但是，猖狂以至嚣张，并不表示有力量，更不代表有胜利的把握。“四人帮”的重新猖狂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他们很快就会作出自己的判决。

4.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

“四人帮”猖狂横行，作恶多端，早已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他们在当时的中国身居高位，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形成一种政治高压，使人民的真正意愿很难表达。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1976年清明前后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就成为一次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最可靠的民意测验，成为最真实的政治晴雨表。

1976年春天，整个中国处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连年的动乱和不断降临的各种灾难，彻底剥掉了“文化大革命”华丽革命词藻的外衣和一度使不少人迷惑的虚幻的反修防修光环。在全国各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已经声名扫地，彻底破产了。

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给在苦闷和焦虑中的全国人民带来希望和信心。可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却像一阵夹带着冰雹的暴雨狂风，把人们心中刚刚升起的希望火焰给扑灭了。就在这样一个阴沉而苦闷的时刻，受到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总理周恩来，又不幸于1月8日离开了人世。而作恶多端使广大群众深感憎恶的“四人帮”，却发布戒条，不准悼念。同时借“批邓”之名肆意横行，强加民意，诬蔑攻击，分外猖狂。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局面，广大群众不能不认真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正如贴在天安门的一首诗所说：

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

……

妲己想统赤县，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①]

正是这样一种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心中的强烈危机感，召唤着广大的工人、干部、学生、知青和军人，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勇地走上全国很多城市的街头。从南京的雨花台到北京的天安门，从古老的西安钟楼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从北国的松江平原到葱绿的南海之滨，掀起一股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群众性的壮阔洪流。这就是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或称“天安门事件”。

① 《天安门诗抄》，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74页。

“四五”运动是一个没有全国性以至地区性的组织领导，也没有统一的宣言或纲领，带有很大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但是，这种由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职业的作者们写成的文字作品，包括新诗、古体诗、词、散文、快板、顺口溜、誓词、倡议书、悼文、政治笑话等等，内容上却有非常大的共同点，就是悼念人民的好总理，赞扬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愤怒斥责“四人帮”。这些诗文构成了在特殊条件下人民自己的舆论阵地，与“四人帮”控制的官方传媒的帮腔帮调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公开的报刊广播电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被大量宣扬的主调，但是，在难以计数的各地张贴的大量诗文中，却没有找到一件是支持和赞成批邓的。相反的却众口一词，对“四人帮”大张挞伐：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①]

变幻之际悼总理，全民作诗为武器。
天兵八亿共除妖，定有革命暴风雨。[②]

如果有人想重新充当“天才”、“天马”，爬到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想当“秦始皇”、“武则天”，重建“蒋家林氏王朝”，他们一定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③]

① 《天安门诗抄》，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4页。
② 《天安门诗抄》，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③ 《天安门诗抄》，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50页。

昔日悼总理，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

识别假马列，怒斥妖婆娘。[①]

这样的诗词是大量的，引不胜引。而“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妖婆娘”、“阴谋家”、“野心家”等等，都成了众所公认的“四人帮”代名词。这就充分说明了全国的人心向背。

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四五”运动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的镇压。这次历史悲剧的造成，固然是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的，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难辞其咎，而“四人帮”歪曲事实，欺骗中央却是一条根本性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江青一伙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着“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旗号发家的。但是，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们是最害怕群众的。因为广大群众真正觉悟之日，也就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灭亡之时。因此，南京事件一发生，王洪文立即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姚文元也让《人民日报》的心腹注意情况，准备反击。他说：“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

---

① 《天安门诗抄》，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4月3日，姚文元还特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专政究竟不是绣花。"3日深夜，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花圈和诗词。他打电话给在公安部的亲信，下令组织人到天安门广场拍照。王洪文说："不拍下来怎么行！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可见，早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给天安门事件定性之前，"四人帮"就给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准备抓人、杀人了。

为此，他们积极策划了两手：

一是，伪造情况，歪曲事实，欺骗中央。按照"四人帮"的指示，首都一些大新闻单位每天都派出一些记者到天安门广场，混在人群中刺探各种消息，然后择其所需地编写成内部的简报报送中央。这个期间，仅《人民日报》就突击编写了10多期《情况汇编》，其中不少都是经过姚文元修改审定的，在欺骗中央方面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因而得到"四人帮"的嘉奖，赞扬"小报"比"大报"的作用还大。张春桥夸奖《人民日报》的心腹说："你们提供了重要的情况，我们很高兴。"

二是，调集力量，准备武力镇压。北京和各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一开始，"四人帮"就密令各地公安部门密切注意动态，派便衣去监视群众的活动。北京在大镇压之前，已经逮捕几十个人。4月2日，在首都正式成立了由公安、卫戍区和民兵联合组成的指挥部，抽调了一批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动镇压。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局长刘传新主持下拟定《对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为镇压群众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4月5

日出动镇压群众的1万民兵（准备3万），解放军5个营（准备9个营）和3000公安干警，实际上是早几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这正暴露了“四人帮”策划已久的镇压群众的蛇蝎心肠。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在“四人帮”的操纵指挥下，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白色恐怖时期。大批群众被迫参加学习批判，交代问题，不少人被隔离审查，一批人被逮捕刑讯，有的还被判刑。目前尚无全面的统计资料，已知的有：作为全国重点立案追查的1984件，涉及人数难以统计。北京市被拘捕的388人，全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南京、杭州、西安等城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镇压。其中辽宁省在毛远新的指挥下，镇压搜捕特别卖劲。被审查处理的达685人。其中拘留213人，逮捕49人，判刑11人。①

“四人帮”对天安门群众运动的被镇压是特别高兴的。江青一伙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帮助他们搜集并歪曲编写情况的有功人士。江青举杯庆贺“我们胜利了”。从表面上看，“四人帮”的阴谋确实暂时得逞了。他们眼中的最大障碍邓小平被认为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只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为了挽救危局而奋起的成百万群众的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又被错误镇压下去了。“四人帮”的统治地位似乎更牢固了。但实际上，却使“四人帮”的反动嘴脸在亿万群众中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一切伪装都完全剥光了。因此，当他们举杯庆祝胜利之日，正是自己铲掉了脚下的最后一块土地，

① 转引自《叶剑英在1976》，第112页。

为自己挖好了坟墓之时。他们误认为，天安门事件宣告了邓小平政治上的死刑，而其实，真正被全国各族人民宣告了政治上死刑的，却是他们自己。

当然，历史的发展到结局的显示是要经历相当过程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抗议运动，代表人民的意志宣告了江青一伙政治上的死刑。但要把人民的宣判实际执行，还需要一些条件。当时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心中考虑最多的问题，按照叶剑英在1977年一次讲话中的说法，叫做“投鼠忌器”。这就是说，当时怕影响到毛主席的身体，不好对江青一伙动手，而必须等待条件伺机而行。

1976年9月9日，中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在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岗位上任职长达40多年的一代革命伟人的长逝，加上此前不久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中国党政领导集团进入了一个大转换的新时期。毛泽东生前就曾预见到：“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会闹事。”事实果然如此。江青一伙把毛泽东的病逝看作是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迫不及待地加紧活动起来。请看下列种种表现：

毛泽东刚逝世，王洪文就背着中央政治局，指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吊唁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王洪文报告。9月11日晚到12日上午，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中央办公厅某工作人员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了电话。“四人帮”企图以此举割断地方党委与中央

的联系，由他们代表中央发号施令。由于有的省委书记及时把这一情况告知华国锋，王洪文的这一指示未得逞。

9月12日，“四人帮”在清华、北大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盗用两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各地党羽也纷纷写效忠信和劝进书。辽宁的那位“白卷英雄”张铁生特别到省里表态。他露骨地说：“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担心。”这个讲话送给了在北京的毛远新。意思很明白，对华国锋很担心，向“四人帮”表忠心，献计谋。

9月16日，他们把伪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即“按既定方针办”，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社论的权威方式，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表。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要求全党全国以此作为宣传中心和基调，在全国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大肆宣扬。

9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全国亿万群众同时追悼默哀。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化悲痛为力量，“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江青身着黑衫，佩戴黑纱，脸色阴沉地站在主席台上。看似十分悲痛，但实则另有所思。追悼大会刚结束，江青来不及换下丧服，就急忙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从秘书张玉凤手中取走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原稿和手迹。张玉凤向中办领导报告此事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报告华国锋。华国锋决定由汪东兴打电话给江青追回毛泽东的手稿。江青为此大发脾气，说什么“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力”，“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走我吗？”但在汪东兴坚持“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理应由中央办公厅保管。在这样的正当理由下，江青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文件交还。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但提出，要不是常委的姚文元、毛远新和她自己参加，而身为副主席、常委的叶剑英不要参加，遭到了华国锋的婉言拒绝。接着张春桥又到华国锋家拜访，提出要毛远新留在北京，为中央三中全会报告作准备，说“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又被华国锋坚决拒绝了。华国锋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使张春桥难以狡辩。

9月21日，张春桥单独找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密谈。徐向张汇报了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在一起密谋的情况。丁盛曾告

徐，驻防在无锡、苏州一线的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他指挥不动，这个军对上海威胁很大。后来的事实证明，让这个军驻防这一带确是中央军委有意安排的一着妙棋。张春桥说，上海还没有经受过“考验”，让他们小心谨慎，“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9月23日，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要求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催促赶快把上海民兵动员起来，发放枪支，准备应付万一。根据“四人帮”前后的多次指示，上海市共给民兵突击发放枪支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1000多万发。

9月28日，张春桥又特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赶回上海，送去他的密信。信上说：“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除写信外，张春桥还让肖木口头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党羽传达他的指示：“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增强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①] 这些话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矛盾公开化了。这次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可是，江青却突然提出一个大问题：“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意思是她应当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同时，又坚持由她自己负责毛主席文件的整理工作。说：“整理主席生前

① 转引自纪希晨：《走向死刑的女皇》，《党员特刊》，1993年第10期。

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她要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毛泽东的著作手稿占为己有，以垄断“最高指示”的发布权。她还再次提出由毛远新起草三中全会报告的问题，说：“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在这样挑衅性的质问面前，叶剑英起而严正对答：“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和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李先念立即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华国锋明确表示，毛远新应回辽宁。

张春桥见势不妙马上抛出一顶新的大帽子，说是对毛主席忠诚要表现在对活着的人的态度上，“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在这样自以为很难反驳的借口下，张春桥提出：“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叶剑英马上反驳说：“这样提问题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毛主席并驾齐驱。”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虽然江青使尽各种手段又哭又闹，但是，会议还是拒绝了“四人帮”的无理要求，他们的安排江青工作，保管毛主席文件和毛远新留北京，三大企图一个都没有得逞。

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主持，但发言的主调基本上被“四人帮”所

控制。而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报道中，都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把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结束语压到不起眼的地位。而在新闻照片上也突出江青和“四人帮”，充分表明了“四人帮”向华国锋逼宫夺权的野心。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并对群众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她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她说：“我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的。”她向年轻人表示要斗到底的决心，说：“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青人宣誓，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和他们斗。”她让年轻人把好吃的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外交部长乔冠华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时，把原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并指出毛泽东原来和他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他也是这样在政治局传达的，要求纠正。这样，就等于向江青一伙赖以欺骗群众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发起了公开挑战。华国锋的这份批示在党中央传阅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张春桥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极力阻止华国锋指示的下达。

10月2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擅令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调一个装甲师到北京。沈阳军区把此事报告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叶帅明确回答：“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军队。”“擅自调动军队的做法，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一律是非法的。”他说：“立即命令孙

玉国，让他把装甲师开回原地。”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京郊的平谷县发表讲话。他猖狂叫嚣：“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他煽动基层党员和干部“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四人帮”的头号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中胡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由“四人帮”喉舌发出的这篇措词尖锐、上纲极高的反党文章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警觉，普遍认为这是“四人帮”公开发出的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已经在天津订制好了准备在庆典时穿的“女皇服”。王洪文也拍好了自己的标准像，准备在庆典时公开悬挂。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居了，党和国家已经到了危亡的边缘。这样就迫使党中央不能不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果断地下决心割掉毒瘤。

对于“四人帮”的种种恶行和阴谋活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在关注着，积极思考着对策。许多有威望的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也采取各种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向党中央献计献策。经过多方沟通，反复谋划，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核心，终于取得统一认识，并策划好当

时最适合的行动方案。10月6日下午，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当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是：（1）审议《毛泽东选集》五卷清样；（2）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3）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通知除送给常委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扩大到非常委的江青和姚文元。一个是主席遗孀，一个是主管宣传和《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十分合理，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当晚，华国锋和叶剑英按照预先商定的方案坐镇指挥，汪东兴早已把特选的逮捕"四人帮"的人员分组安排好，从容实施。第一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华国锋当面向他宣读了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后，就由武装人员把他带走了。王洪文曾企图反抗，但被打翻在地。姚文元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江青没来开会，是在家里被逮捕的。毛远新等一批党羽也随后被逮捕归案。上海党羽举行武装叛乱的图谋，也失败流产。同时，党中央又派人控制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要害单位。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四人帮"这个大祸害。

曾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快速上升到中国政治最高峰之后，急骤下沉到政治的最低谷，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阶下囚。为中国政治史上这一幕最奇特的政治浮沉剧拉上了帷幕。这一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到这里这本书似乎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有一个重要的尾声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

命集团的审判。这是建国以来公开审理的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宗案件，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的关注和轰动。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十六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而成立的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在正义路1号正式开庭。被传审的被告人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江腾蛟。另有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因已经身亡，不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次审判历时两个月零七天，经过42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49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实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开庭宣判，由庭长江华宣读了特法字第1号判决书：

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作恶多端，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出1983刑执字第1号裁定书，对江青以“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为理由，减为无期徒刑）。



江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于1980年11月2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被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图为江青在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



张春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图为张春桥在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



姚文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图为姚文元在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



王洪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图为王洪文在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

张春桥，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据与江青相同理由，减为无期徒刑）。

姚文元，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直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长期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伙同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四人帮”的重要党羽：毛远新、迟群、刘庆棠、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张铁生、翁森鹤、张永生、唐岐山等，也分别受到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这样，以江青为首的这批借“文化大革命”之势而青云直上，一度权势赫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反革命集团，终于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世人的唾骂。长达十年之久的一段充满灾难和痛苦，留下无数辛酸记忆的历史，最终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而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历史留下的思考……

研究这段历史，既不是要抚摸伤疤叹息，更不是要和某些人故意过不去，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提高认识客观规律的本领，增强搞好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自觉性。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从“四人帮”浮沉的历史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主要的经验教训呢？简言之：

第一，“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设想没有神化领袖导致个人专断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破坏；没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大混乱，那种党和政府机关普遍陷入了瘫痪的状况；没有宪法、法律和一切规章制度的严重废弛；没有“造反有理”的普遍性的“左”倾狂潮，没有由于这一切而造成的独特的历史条件，“四人帮”就根本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横行达十年之久。因此，要防止再出现“四人帮”这样祸害极大的反革命集团，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绝对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搞个人崇拜，绝不能再搞任何名目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第二，“四人帮”所以能猖狂一时，迷惑和欺骗了不少人，靠

的是一块理论招牌，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误断造成的。这个错误理论当时被赞扬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和“绝对权威”。而“四人帮”正是如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因此，应该尽最大努力防止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犯错误，更应注意不要使错误理论被坏人所利用造成重大损失和灾难。

第三，坏人再猖狂也只是暂时的，最终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人民群众。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气焰熏天，十分嚣张，但既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性质，更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大方向。最终逃不脱失败命运的只是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林彪的折戟沉沙遗臭万年，江青一伙被庄严判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最有力的铁证。因此，我们必须永远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四人帮”沉浮录
作者=金春明著
页数=227
SS号=13248528
DX号=
出版日期=2013.06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